

唐宋時期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

國立故宮博物院 器物處 嵇若昕

提 要

本文兼採古今，使用「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三種硯式名稱，藉數十年來的科學考古出土資料，釐清其形制，並討論其發展、演變的歷史，一方面方便嗣後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使用一致的名稱，一方面可提供各公私收藏單位從事藏品訂年時的參考。

文中首先「釋名」，訂定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的基本形制，接著檢視目前已公布的考古出土唐、五代與兩宋時期此三種硯式演進的軌跡。此外，昔日學界多未曾關注與兩宋大致並立的遼金兩代轄境內使用的硯式，本文第四節即根據目前已公布的考古出土資料，檢視遼金時期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的使用情形。

硯式之外，本文並根據考古出土資料專節討論唐宋遼金時期製作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所選用的硯材。由於唐宋文人重視石硯材的發墨而不損筆，端、歙二石獨占鰲頭，但是唐代的陶硯或澄泥硯的使用頻率依然較高，宋代澄泥硯材與端石、歙石和洮河石並列四大名硯。文末附帶論述唐代箕形硯的支系—龜形硯，以及近代玩硯者所誤認的陶水盛（例如著名的所謂十二峰陶硯）。

昔日文人處於書房，經常坐於書桌前，文房用具成為他們最親密的戰友，其中「研（硯）為文房最要之具」¹，而且「文人之有硯，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之中，最相親傍。故鏡須秦漢，硯必宋唐」²。前者見於明晚期鑑賞家高濂有關燕閒清賞之書，後者是明代中晚期吳派書畫家陳繼儒（1558-1639）賞硯的心得。由此可見，在明代中、晚期文人玩賞古硯時，多上追唐宋，但是陳繼儒也說：「唐之澄泥硯品為第一，惜乎傳少而今人罕見。」³從玩硯的歷史看來，其所謂「唐之澄泥硯」是否真

1 高濂，《遵生八牋·燕閒清賞牋》（萬曆十九年〔1591〕刊本），卷15，頁15，「論研」條。
2 陳繼儒，《妮古錄》，收於《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14編第4冊，卷2，頁2357。
3 同註1，頁18。

是唐硯，仍待商榷；若然，也可能僅指箕形硯或風字硯，對於唐代的多足硯或已不識。至於清代乾隆朝于敏中奉敕整理宮中藏硯，精細繪圖、測量尺寸並抄錄硯銘，集眾人之力編纂而成的《西清硯譜》一書中所收錄的唐硯的可信度，更值得商榷。

個人曾藉考古出土資料，基本釐清六朝隋唐時期的圓硯與方硯之演進情形⁴，六朝的三足圓硯乃承繼東漢的三足帶蓋石硯，但以陶瓷取代石材。三國兩晉多僅是三足，南北朝時足數大增，可多至十四足。至於隋唐常見的辟雍硯，在南北朝時已見端倪。唐代的多足硯比較集中出現在初唐（618-683）與盛唐（684-755）的墓葬中，也就在此時，發展出新的硯式—箕形硯，不久便取代多足圓硯在文具中的地位。隨著歷史的演進，風字硯與抄手硯相繼出現，各展風流。

一、釋名

五代以前文人玩硯時尚未注重硯式⁵，今日所能見到最早集錄前人與自己玩硯心得編著而成的譜錄之類書籍，是南唐宋初的蘇易簡（957-995）編著的《文房四譜》，書中提到的硯式有如馬蹄者，如蓮葉者，「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腰半微凹，謂之郎官樣者」，以及「圓如盤而中隆起」的辟雍硯（又名分題硯）⁶。文中並無箕形硯、風字硯或抄手硯之名。

接著，鑑賞家米芾（1051-1107）於其《研史·樣品》中提到的硯式有「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十蹄圓銅硯」、「鳳凰池」、「風字」、「類箕象」、「馬蹄樣」等等⁷，前二圓硯應是六朝至盛唐時流行的硯式⁸，至於風字硯，其以為名之為「鳳皇池硯」更宜，而且其指出這種硯式相當多樣。除了有風字硯之名，文中又有形如「箕象（像）」的硯，雖非箕形硯之名，卻也相類；馬蹄樣則可能似風字外形而較短小。

米芾在《研史·樣品》中所提到的《歙州硯圖》，清人認為是宋人唐積所撰之

《歙州硯譜》⁹，書中〈名狀第六〉所敘硯式已有四十種之多¹⁰，其中有風字樣、端樣、玉堂樣、方玉堂樣等，但並無箕樣或抄手樣等名稱。

宋人在《歙硯說》曾記載王羲之生前所用的硯有「端樣」、「硯板」與「硯鏡」之類¹¹，根據描述，端樣應是風字硯。此外，李之彥與高似孫等宋代好硯之士各在其所撰《硯譜》與《硯箋》書中記述：有人自稱是東晉大書家王羲之的後人，拿一件大至一尺多的風字硯求售，標榜此硯是王羲之生前所用硯，石揚修（995-1057，官至刑部員外郎）出錢二萬方得之¹²。但東晉時並無風字硯式，故當時人所常稱道的王羲之生前用硯應是贗品。除了稱為端樣的風字硯，另二類硯池微凹的長方硯與圓硯，應是平底無足的硯式。

此外，南宋初年所撰的《端溪硯譜》¹³中，收錄了四十八種硯式，關於風字硯就分成平底風字、有腳風字、垂裙風字、古樣風字、琴足風字等五類，此外尚有箕樣、斧樣、鳳池等形制可能相近的硯式。此書中沒有玉堂硯式之名，卻有玉臺之稱。

宋人愛硯、玩硯，硯式日漸增多，降及南宋，硯式或已多至難以勝記，故在宋代最晚出的硯譜—《硯箋》中，只錄二十四種「近雅者」的硯式，其中包括鳳池、玉堂、玉臺、郎官樣、風字、斧樣、馬蹄樣等¹⁴。

雖然宋人所撰寫的硯譜留下之硯式名稱相當多，但因各書中的硯圖皆已不傳，後人無法分辨鳳池、風字、箕樣、斧樣、郎官樣、馬蹄樣等究竟是什麼形制，至於日人所稱的太史硯式與今日常稱的抄手硯式皆不見宋人提及。由於名稱的分歧，使得宋代以後的文人玩賞古硯時，往往各說各話，找不到交集¹⁵，在傳世古硯的年代

9 唐積，《歙州硯譜》，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故宮景印），843冊，頁64-65，書前「解題」指出：因為書之卷末有「大宋治平丙午歲重九日」字樣，推測可能於北宋仁宗治平三年（1066）成書。

10 同前書，頁75-76。

11 不著撰人，《歙硯說》，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843冊，頁82，云：「舊有古端樣，并世傳晉右軍將軍王逸少端樣，皆外方內若峻坂，今之端樣蓋其遺法也。或有為硯板、硯鏡之類，微凹其首而已。或直用平石一片，別以器盛水旋滴入研墨。」同前書，頁64~65云：該書在《古今圖書集成》中逕指出作者是北宋洪邁之兄洪适，《四庫全書》中的解題則說洪适只是刊刻人，洪邁在紹興三十年（1160）十二月作跋，可作為此書出版時間的參考。

12 李之彥，《硯譜》，收於《器物珍玩編》（上海古籍，一九九三年），頁一九四，「右軍風字硯」條。

高似孫，《硯箋》，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843冊，頁101，「右軍硯」條。

13 不著撰人，《端溪硯譜》，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843冊，頁89。《四庫全書》中的解題指出：因卷末有淳熙十年（1183）東平榮芑的跋說此書是葉樾所傳，因而後世曾誤傳是葉樾所撰。原書中稱宋徽宗為太上皇，因而認為是南宋紹興初期之人所撰。

14 高似孫，《硯箋》，收於《文淵閣四庫全書》，843冊，頁101。

15 例如日人窪田一郎，《硯知識鑑賞》（東京：二玄社，1977），頁20，所圖示的風字硯即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編，《歷代硯台展》，頁54，書中所指稱的風字硯不同。類似情形，在各相關書籍、文章中一再出現。

4 嵇若昕，〈從考古出土資料試論六朝隋唐的圓硯與方硯〉，《輔仁歷史學報》，No 11（2000），頁55-95。

5 嵇若昕，〈玩硯瑣談〉，《歷代硯台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7），頁29-43。

6 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收於《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6編4冊，頁2289，「二之造」。

7 米芾，《研史》，收於《美術叢書》（台北，藝文），4集3輯，頁288-292，「樣品」條，云：「有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有十蹄圓銅硯，中如鑿者；……有上圓下方，于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此甚多，所謂鳳皇池也。……世俗呼為風字，蓋不原，兩足之製謂之鳳足。……鳳之義取五色英文，粲然成章也。……頭狹四寸許，下闊六寸許，頂兩純皆綽慢，下不勒成痕，外如內之製，足狹長，……中凹成白。……，頭微圓又類箕象，中亦成白矣。……一圓頭鳳硯，……頭純直微凸，如書鳳字，左右純斜刊，下不勒痕，折向頂亦然。……其外隨內勢簡易，其後……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闊，而足或圓為柱。……史院官硯，……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至作馬蹄樣，……」。

8 嵇若昕，〈從考古出土資料試論六朝隋唐的圓硯與方硯〉。

推定上更是自由心證。除此之外，因為硯式名稱的不統一，近人在撰述公私收藏古硯或考古出土之硯時，也莫衷一是；例如一件出土於北京元大都遺址的石硯，出土報告中稱其為「風字硯」¹⁶，此硯現藏於北京首都博物館，在該博物館所編撰的藏硯圖錄中則稱為「鳳字形」硯¹⁷；又如同樣出土於北宋葛閔（1049）墓中的兩件抄手硯，報告撰寫人分別稱為「箕形硯」與「鉞形硯」¹⁸。

本文兼採古今，使用「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三種硯式名稱，藉數十年來的科學考古出土資料，釐清其形制，並討論其發展、演變的歷史，一方面方便嗣後進行相關研究時可使用一致的名稱，一方面可提供各公私收藏單位從事藏品訂年時的參考。此外，亦可為考古工作者在研究出土相似古硯的非記年墓時，增加一項推斷時代的依據¹⁹。

凡是硯首圓弧而底部著地，尾端翹起而呈尾高首低，自尾部往硯首斜下呈斜坡狀，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圓弧，形成槽臼之狀，兩側邊與硯首邊緣轉折圓弧，一氣呵成，硯尾下方往往有一或二足，以二足較常見的硯形，因與古代畚箕的外形非常相似，稱之為箕形硯。若硯首已趨向平直，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兩側邊與硯首邊緣成稜角狀轉折，首尾高度接近，則名之為風字硯；風字硯亦有一足或二足，後者較常見，一度也出現平底無足者。兩者皆有除尾端外硯面其餘三邊向外突出成裝飾帶，或僅硯首向外突出裝飾者。至於抄手硯，既非平底，尾端也無足，而是在兩側邊自硯首至硯尾垂下扁平側壁，初期墨堂仍呈斜坡狀，後來自硯尾往硯首逐漸演變成平台狀。（圖一）

若與《端溪硯譜》書中南宋初年人所指稱的古樣風字、有腳風字、垂裙風字、平底風字與琴足風字諸硯式就字面意義比對，箕形硯可歸為「古樣風字」硯式，有一或二足的風字硯為「有腳風字」硯式，抄手硯則是「垂裙風字」硯式，外形呈風字的平底硯即是「平底風字」硯式。發展初期的抄手硯之墨堂仍呈斜坡狀，後來逐漸演變成平台狀，不過仍可歸為「垂裙風字」硯式。

16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遺址〉，《考古》，1972年6期，頁10。

17 首都博物館編，《首都博物館藏硯》（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7），頁8。

18 江陰縣文化館，〈江蘇江陰北宋葛閔夫婦墓〉，《文物資料叢刊》，N0. 10（1987），頁38、171-174。

19 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揚州的一座五代以前即被破壞的墓葬中出土一批彩繪俑以及青釉碗、箕形石硯等，考古工作者因青釉碗與箕形石硯推測為唐代前期墓葬，若依據硯式（見下文），應是中唐末、晚唐的石硯。見李萬、張亞，〈揚州出土一批彩繪俑〉，《文物》，1979年4期，頁1-5。

二、 考古出土唐與五代時期的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

若將唐代分成四期，即初唐時期，約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高宗弘道元年（683）；盛唐時期，約自武則天光宅元年（684）至玄宗天寶十四年（755）；中唐時期，約自肅宗至德元年（756）至文宗開成五年（840）；晚唐時期，約自武宗會昌元年（841）至唐亡（907）²⁰。就已發表的資料而言，至遲在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已開始使用箕形陶硯，也就是說箕形硯在盛唐初期即已出現。（表一：1）就目前所知的出土於紀年墓中時間最早的這件箕形硯形制相當樸素，硯面呈橢圓形，硯首口沿尖直而底部著地，尾端寬口敞開，其下部有兩撇足，乃刀削而成，出土時墨堂尚遺留墨跡²¹。（圖二：1）

與前述這件箕形陶硯同樣出土於寧夏固原南郊而埋葬年代早四十一年（顯慶三年，658）的史索岩夫婦墓中，所出土的硯即是綠釉辟雍硯²²（圖二：2），至八世紀初（中唐中期）仍相當盛行使用這類精美的辟雍硯²³。

盛唐時期除了辟雍硯與其他多足圓硯外，箕形硯也出現了。箕形硯的形狀除了樸素者外（表一：1，5），也相當多樣化，有的在硯首外沿發展出裝飾帶，例如河南偃師杏園村宋禎墓（706）中出土的箕形硯硯首即突出多凹弧邊裝飾帶²⁴（表一：3，圖二：3）。宋禎生前曾任延州刺史，授正議大夫，官至四品，這件箕形硯置於棺內，或可推測其鍾愛之情。此時也有箕形硯的槽臼式硯池邊緣（硯首位置）裝飾成蓮瓣狀的情形²⁵（表一：6 劉姓夫婦墓，754）。至於足形，有撇足（梁元珍墓，699）、長方足（宋禎墓）、乳丁足（劉姓夫婦墓）外，尚有將原或為乳丁足修整成四邊形而上大下小者²⁶（表一：4 張九齡墓〔740卒，數十年後遷葬〕，圖二：4；

20 唐代分期的方式不一，此處採用唐詩的分四期，至於細部的年代，則參考周世榮的分期年份，見氏著，〈長沙唐墓出土瓷器研究〉，《考古學報》，1982年4期，頁509-523。

21 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3期，頁1-9。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博物館（羅豐主編），《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1996），頁117-135。

22 嵇若昕，〈從考古出土資料試論六朝隋唐的圓硯與方硯〉，文後所附〈六朝隋唐出土方硯或圓硯紀年墓參考表〉漏列此座紀年墓（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博物館〔羅豐主編〕，《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頁31-54），史索岩夫婦墓中出土一件綠釉辟雍瓷硯，有九足，作人面蹄足，足下一圈托座，高2.6公分，徑6公分。類似小尺寸的多足辟雍硯，出土於隋唐紀年墓者尚有隋斛律徹墓（597，徑7.2、高3.5cm）與唐冉仁才夫婦墓（654，徑5、高1.8cm），其是否是明器，值得思考，但是斛律徹墓出土的辟雍硯之圈足間飾六個蹲跪力士與忍冬紋，相當精美。

23 例如懿德太子李重潤（682-701）墓中及曾出土兩件三彩辟雍硯，陝西省博物館、乾縣文教局，〈唐懿德太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7期，頁26-31。

24 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5期，頁429-457。

25 平頂山市文管會，〈河南平頂山苗候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3期，頁27-28。

26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唐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5年1期，頁14-31。

表一：5 鄭炅墓〔721 卒，754 葬〕，圖二：5）。此時硯足多自硯尾稍稍縮入，但是也有於硯尾兩端直接伸出硯足的情形，例如出自宋禎墓的箕形硯即是此類。除了紀年墓外，一些根據墓葬形制或其他出土文物推測為盛唐墓者，也不乏出土前述箕形硯的實例²⁷。

中唐時期是箕形硯式逐漸往風字硯式演進、發展的時期，硯首的弧度漸漸平齊（表一：7 鄧俊〔？，763〕墓，表一：8 鄭洵夫婦墓〔778〕，圖三：1，2），至九世紀初可能出現了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而非槽臼式的硯池（表一：11），但是因為是五〇年代的早期出土物，報告撰寫得並不詳盡，也無附圖，僅註明參考前一年出於長沙北郊唐宋墓的實例²⁸，依後者所附圖版，其外形呈風字，首微弧，兩側弧線外撇，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而非槽臼式的硯池。

雖然前述鄧俊（？）墓與鄭洵夫婦墓所出土的箕形硯之外形已漸趨規整，略具風字硯的外形，但是硯尾依然翹起，硯池仍呈槽臼式。不過出自盛唐後期鄭炅墓的箕形硯之首尾高度即已一致，南京錢家渡丁山所發現墓主人卒於唐貞元元年或三年（785,787 表一：10）的中唐時期墓葬中所出土的箕形陶硯的首尾之高度亦趨一致（圖三：3）。

因為石質的採用，中唐晚期與晚唐時期的箕形硯外形更規整，硯首圓弧，兩側平直，首尾高度一致，長方形硯足磨製整齊，目前所知紀年墓中時間最早的是早年出土於河南陝縣劉家渠中唐末（開成三年，838，表一：13）墓葬中的「紫石風字硯」²⁹，但原簡報對此硯既缺詳盡敘述，而且並未發表圖版，在此無法作進一步論述。但是出土於安徽合肥而時間晚兩年的一座船形磚墓（開成五年，840）中的歙石硯³⁰（表一：14），雖然樸素無雕飾，然外形相當規整，硯首圓弧，兩側平直，首尾幾近等高，長方形硯足磨製整齊。至於出土於河南偃師杏園村的李郁墓（843，表一：16，圖四：1）和李存墓（845，表一：17，圖四：2）的規整石硯，形制與前述歙石硯相同，李郁墓所出的石硯「石質堅硬，打磨光滑」³¹，李存墓所出土的石

硯是「紫石硯，……石質堅硬，磨製光滑」³²。不論是前述出土於安徽合肥的歙石硯，或是李郁墓與李存墓出土的石硯，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皆圓弧成槽臼式的硯池，故而依然必須歸為箕形硯式，只是更向風字硯式接近。

不過歷經中唐時期箕形硯式逐漸往風字硯式演進、發展階段，晚唐時期發展出了真正的風字硯，1983 年底，安徽巢湖市環城鄉曾搶救發掘一座紀年唐墓（會昌二年葬，842，表一：15），墓主人伍鈞是春秋時期伍子胥的後人，伴隨墓中所出土的精美白瓷器之遺物，有一件風字紫石硯，硯的首尾皆呈弧形，腰呈弧線內收，硯背斜直，原有兩長方足，一殘，另一側刻「寧」字，硯背刻「伍」字。長 14.1 公分³³。（圖四：3）

同樣出土於河南偃師杏園村而比李郁墓或李存墓皆晚的李悅墓（869，表一：18）中曾出土兩件陶硯，一件呈灰色，外形規整，硯首圓弧，兩側邊平直，首低尾高，有槽臼式硯池（圖四：4），應屬箕形硯式；另一件呈黑灰色，外形亦規整，硯首內緣圓弧，外緣轉折成出三直邊，兩側邊呈外撇的弧形，首尾同高，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而非槽臼式硯池（圖四：5）。雖然後者的硯首外緣有三直邊，但是兩側邊與硯首邊緣成稜角狀轉折，硯池又非槽臼式，而是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已應歸入風字硯式了。同一座紀年墓，既出土箕形硯式，也出現風字硯式，充分顯示此兩種硯式同時並用的情形。

除了河南偃師與安徽巢湖曾出土箕形紫石硯，在陝西西安郊區中、晚唐的墓葬中也曾出土紫石硯³⁴，長 11.4 公分，最寬 7.5 公分，其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而非槽臼式的硯池，足呈長方形，與安徽巢湖伍鈞墓一樣也是風字硯的形制了。同樣形制的硯，在廣州也曾出土一件，目前收藏於廣州市博物館³⁵。當然，晚唐陶製的風字硯也是不乏其例，除了李悅墓外，1991 年 11 月湖北黃州市王家坊曾發掘一座唐墓，考古工作者根據墓中所出土的青瓷盤口壺、燈盞及「開元通寶」錢，訂為唐代末期，同墓中出土一件泥質灰陶硯，即作風字硯式³⁶（圖四：6）。

當風字硯式已然發展成熟階段，盛唐以來盛行的箕形硯仍見使用，例如 1989 年 9 月於廣東和平縣彭寨墩頭村發掘的一座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員依據出土文物並與同時發掘的其他墓葬排比，推測為晚唐至五代的墓葬，墓中所出土的泥質灰陶箕形硯³⁷（圖四：7），硯首圓弧而底部著地，尾端翹起而呈尾高首低，墨堂自尾部往硯首

27 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台〉，《文物》，1965 年 12 期，頁 41-42，第一三、一四、一五、一六。

中科院考古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1966），頁 62。

28 絲茅沖工作小組，〈長沙絲茅沖工地第一工區的古代墓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11 期，頁 46-62。

王與綱、趙國壁，〈洛陽十六工區清理唐墓一座〉，《文物》，1956 年 12 期，頁 77

29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7 年 4 期，9-21。

30 合肥市文管處，〈合肥市發現明代瓷窖藏和唐代邢窯瓷〉，《文物》，1978 年 8 期，頁 52-53。安徽省博物館主編，《文房珍品》（香港：大業，1995），頁 206。

31 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 年 12 期，頁 1-23。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 年 10 期，頁 904-914。

33 巢湖地區文物管理所，〈安徽巢湖市唐代磚室墓〉，《考古》，1988 年 6 期，頁 522-527。

34 中科院考古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頁 82。

35 劉演良，〈端硯淺談〉，《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4，頁 78-82。

36 黃州市博物館，〈黃州市王家坊唐墓的清理〉，《江漢考古》，1997 年 2 期，頁 14-17。

3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縣博物館，〈廣東和平縣晉至五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00 年 6 期，頁 62-72。

斜下呈斜坡狀，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圓弧，形成槽臼之狀，兩側邊與硯首邊緣轉折圓弧，比較接近早期箕形硯的硯式，但是硯足製作相當規整的硯式，則需遲至中唐末方始出現。

不論是中唐或晚唐的箕形硯與風字硯，其硯足多是自硯尾稍稍縮入，直接於硯尾兩端伸出硯足的情形雖然也可得見，相較之下，頻率較低，而且很可能其硯式比較接近早期箕形硯的形制，例如前述出土於廣東和平縣彭寨墩頭村的泥質灰陶箕形硯即是其例。

即使降及五代，這類比較接近早期箕形硯式的陶硯依然被使用，例如江蘇揚州的一座五代墓中即曾出土灰陶箕形硯³⁸，硯池成槽臼式，尾端翹起，但是規整的長方形雙足則顯露出其並非早期的箕形硯式。（圖五：1）

當然，晚唐已發展完成的風字硯式，五代十國時期出現的頻率實有增多的現象，在北方有出土於河南洛陽的後梁高繼蟾墓（909，表一：19，圖五：2），根據墓中所出土的石墓志可知：墓主人生曾前任教坊使，封銀青光祿大夫，墓中伴隨出土的泥質灰陶硯即作風字硯式，「硯內有墨跡，為實用器」³⁹。南方十國境內已報導出土的風字硯實例較多，湖南長沙市郊楚國墓（896-951）中曾出土底部刻有「聞人」二字的紫灰石風字硯，也曾出土圓柱形單足的風字石硯，周邊尚刻飾柿蒂紋，乃採青灰色板岩製成⁴⁰；安徽青陽南唐墓（937-975）中曾出土雙足呈矮長三角形的風字陶硯⁴¹（圖五：3）；浙江樂清五代墓中曾發現厚而高的風字陶硯，為黑色細泥製成，質地細膩⁴²，可能是一件澄泥硯（圖五：4）；1987年廣東和平縣附城鎮的五代墓則曾出土平底風字石硯⁴³（圖五：5），以及1998年8月底至10月初廣州市東山區二號灰坑中除了出土瓷器與五代十國時期鑄造的「開元通寶」錢幣外，還出土一件平底的風字端硯⁴⁴，其皆是宋代平底硯的先聲。

五代十國時期廣東地區出現平底風字硯式，在江蘇楊吳時期（892-937）或吳越時期（895-978）的貴族墓中則皆曾發現抄手石硯的實例。例如1975年4月在江蘇邗江蔡莊縣西的蜀岡上發掘一座中年女性墓，墓主人可能是唐末五代初楊吳時期太祖

38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江蘇揚州五台山唐、五代、宋墓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10期，頁533-536。原文中記錄此箕形陶硯長1.72公分，厚0.5公分，就圖推測，可能長17.2公分。

3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文物》，1995年8期，頁52-59。

40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長沙市郊五代墓清理簡報〉，《考古》，1966年3期，頁159-166。

41 青陽縣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陽縣發現一座南唐磚室墓〉，《考古》，1999年6期，頁92-93。

42 溫州市文物處，〈浙江樂清縣發現五代土坑墓〉，《考古》，1992年8期，頁762，764-765。

43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平縣博物館，〈廣東和平縣晉至五代墓葬的清理〉，《考古》，2000年6期，頁70，將出土這件陶硯的墓葬（HFZM1）列於晚唐五代墓系列，但是圖版捌：3則逕將該硯的時代標示為「五代」。

44 《中國文物報》，1998年11月29日，1版，報導稱為「平底的鳳字形端硯」。

楊行密之女，其卒於順義七年（是年十一月改元為乾貞，927），葬於乾貞三年（是年十一月改元為大和，929）。此墓已被嚴重盜掘，在現存遺物中有一件端石抄手硯，磨製規整，硯內殘存墨跡，硯長12、寬8、厚1.6公分⁴⁵（表一：20，圖五：6）。另在江蘇蘇州七子山五代吳越時期墓葬（M1）中也出土一件形制相近的抄手石硯，長20.2、寬12.7-14.7、高3.7公分（圖五：7）。考古工作者根據墓葬結構、出土遺物（秘色瓷器、銅器、陶俑等）以及棺床上殘留的三顆牙齒（經上海自然博物館人類學組鑑定為一男性青年），以及此墓在吳越王之子廣陵王錢元璿墓西邊，推測其「可能是與錢氏直接有關的五代時期貴族墓葬」⁴⁶。

出土的唐、五代的箕形硯與風字硯以光素無紋飾者居多，但也有硯首或三邊突出裝飾帶的情形，前者除有前述宋禎墓的出土實例，洛陽出土古硯也曾得見實例⁴⁷（圖五：8）。在槽臼式硯池邊緣（硯首位置）裝飾成蓮瓣狀的情形除了有出自河南平頂山苗候劉姓夫婦墓的箕形硯外，洛陽亦曾得見⁴⁸。前述這幾件硯首部位硯池內外有裝飾之箕形硯都出自盛唐墓葬，出土於洛陽的晚唐、五代箕形硯，也不乏硯首有裝飾帶或硯池邊緣有蓮瓣裝飾的箕形硯實例⁴⁹。1953年山西大荔縣南鄉念橋村曾出土一件風字陶硯，硯面留有墨跡，硯尾邊緣稍弧，硯首平直，兩側邊內縮後尾端外撇，三邊向外側突出裝飾帶，浮飾蟲魚蔓草紋⁵⁰，原即訂為唐硯，若考慮其硯首平直，兩側邊內縮後尾端外撇的硯面，可訂為晚唐五代之硯。

唐、五代的箕形硯或風字硯多作雙足，間有單足者，其硯池底部著地以與雙足成鼎立之姿，或與單足共同負載硯的重量。但在出土或傳世品中，也曾發現硯首另有一單足的實例，1965年初湖南益洋桃花輪磚廠在鹿角山取土石發現一件箕形陶硯，硯首有高浮雕龍首形裝飾，其下方即有一足⁵¹。此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三足箕形陶硯，足上方飾獸首，下作多邊花式，硯首的一足僅餘獸首，斜坡狀的硯面也不是從硯尾直通至硯首，而是近硯首三分一部位有一向硯首弧突的彎弧形欄，以隔開墨堂與硯池⁵²。

箕形硯或風字硯的斜坡狀墨堂多是從硯尾直通至硯首，但是偏向硯首處有一隔

45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年8期，頁41-47。

46 蘇州市文館會、吳縣文館會，〈蘇州七子山五代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2期，頁37-45。

47 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台〉，圖四：5。

48 同前註，圖四：4，及「一三 盛唐 陶硯」、「十四 盛唐 陶硯」條。

49 同前註，圖四：13，及「二三 晚唐一五代 箕形陶硯」、「二七 晚唐一五代 陶硯」條。

50 朱捷元、黑光，〈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幾件硯台〉，《文物》，1965年7期，頁48-51。

51 王啓初，〈湖南省博物館的幾方藏硯〉，《文物》，1965年12期，頁51-54，「四、唐 鰲頭陶硯」條。

52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北京：文物，1979），頁12，「四、唐 三角紅陶硯」條。

欄的實例除了有前述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的藏品外，早年洛陽盛唐墓葬中曾出土這類硯，已發表的資料有兩件，一件出土於洛陽十二工區 6.2.的 M2，硯池邊緣作七曲蓮瓣形裝飾，另一件出土於洛陽鋼廠 M35，硯池邊緣也有七曲蓮瓣形裝飾⁵³（圖五：9）。

關於盛唐以後逐漸盛行箕形硯式，有人以為與唐代席地而坐有關，硯的尾端高，硯首低，磨墨時易於向前推磨⁵⁴。但是六朝、隋唐前期也多是席地而坐，卻是多是使用平台狀的圓硯與方硯，則不易解釋。不過對於使用几案較矮，坐具相對較高的時代，斜坡狀的墨堂的確較方便磨墨！因此，硯式與文房桌椅的關係如何，應是一個可資研究的課題。

三、考古出土兩宋時期的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

宋代基本上已不常使用箕形硯⁵⁵，抄手硯式也比風字硯式常見（參閱表二），但是遲至南宋中期仍能見到風字硯被使用，例如 1971 年出土於江蘇江浦的一座南宋墓（表二：14），墓主人張同之係唐代詩人張籍之後，他自己曾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卒於慶元元年（1195），其婦章氏卒於慶元五年（1199）。張同之墓出土隨葬遺物有兩件石硯，一端一歛，端石硯即作風字形，兩腰內縮，墨堂平坦，首鑿硯池，尾部下方附雙足，硯長 13.3、寬 8.8-10.7、首厚 1.8、尾厚 0.8 公分⁵⁶。（圖六：3）就所發表的圖版看來，雖然硯尾下方直接伸出長方形雙足，但是兩側邊仍稍下垂自足內側斜弧至硯首，墨堂又平坦而非呈斜坡狀，與晚唐、五代的風字硯並不相同。

北宋的抄手硯外形多呈梯形，也就是三邊平直，但是也有兩腰內縮者，例如北宋葛閔夫婦墓（1049，表二：3）中出土的兩件抄手硯，一件硯面呈直邊風字形，另一件的硯首圓弧，中腰內縮⁵⁷。類似的硯面呈風字的抄手硯，在山東牟平縣北頭 M2 亦曾發現，是一件陶硯，壁較薄，曾經使用⁵⁸。

從黑白圖版看來，葛閔夫婦墓出土的這兩件抄手硯的墨堂似乎仍呈斜坡狀。北

宋中後期（十一世紀後半葉），抄手硯的墨堂漸趨平坦，硯池凹陷，在曾鞏墓（1083，表二：8）中出土的抄手硯硯池呈斜坡狀⁵⁹，寬度幾佔硯面的三分之一，李彬墓（1091，表二：9）出土的抄手石硯也如是⁶⁰，都比較接近斜坡狀的墨堂。至於北宋末的慕伉墓（1116，表二：12）所出土的石硯，墨堂與硯池幾乎各佔硯面的一半⁶¹（圖六：4），已可說是平坦的墨堂了。稍晚的馬紹廷夫婦墓（1118，表二：13）男棺中所出土的端石抄手硯之墨堂則超過硯面的一半⁶²。

受限於已發表有限的紀年宋墓，墨堂漸趨平坦的情形似乎遲至北宋後期，但是江蘇吳錫興竹的一座宋墓所出土的歛石抄手硯，墨堂與墨池也幾乎各佔硯面的一半。考古工作者依據墓中出土漆器的銘文，推測為北宋中期墓葬⁶³。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硯中，有一件原為杭州私人舊藏的抄手陶硯，墨堂雖然稍斜，但比起斜坡狀墨堂，坡度相差甚多。其硯背刻行書銘：「己巳元祐四祀姑洗月（三月）中旬一日，雕造是者，蘿土澄泥，打摸割刻，張思淨題口（花押）。」⁶⁴ 這件抄手硯的墨堂即使仍作斜坡狀，比起稍早如田三郎墓（1077，表二：5）、謝文詣墓（1077，表二：6）所出土的抄手硯（圖六：1，2），其墨堂尾端仍比較平緩。

北宋中後期的抄手硯之墨堂逐漸平坦，硯面也由梯形逐漸變成長方形，例如早年（民國九年，1910）河北鉅鹿北宋大觀（1107-1110）以前的北宋城遺址出土物中，即不乏尾端無欄的長方形抄手硯，其墨堂與墨池約各佔一半⁶⁵。（圖六：5）雖然如此，墨堂作斜坡狀的抄手硯仍與有平坦墨堂的抄手硯並行不悖，例如一座出土於江西南豐縣桑田的北宋晚期夫婦分室墓，男室出土的抄手石硯之墨堂平坦，女室出土的抄手石硯則作斜坡狀墨堂⁶⁶。

抄手硯的硯尾一般都沒有邊欄，作開口狀，但是前述謝文詣墓所出土的抄手陶硯硯尾就有邊欄，即硯面四邊都有邊框，硯面作橢圓形，而非常見的梯形。類似情形在上海博物館所藏古硯中，有一件原為杭州私人舊藏的抄手陶硯硯尾也有弧形邊欄，硯面作上下邊皆呈弧線的梯形，墨堂已趨平坦，其硯背刻行書銘：「邢州平鄉縣王固村王功靖自造硯子，紹聖五年（1098）三月日口（花押）。」⁶⁷ 紹聖僅四年，

59 許智范，〈南豐讀書岩與曾鞏墓文物〉，《中國文物報》，1995 年 7 月 30 日，第四版。

60 鎮江市博物館、溧陽縣文化館，〈江蘇溧陽竹簣北宋李彬夫婦墓〉，《文物》，1980 年 5 期，頁 34-39。

61 李元章，〈山東棲霞市慕家店宋代慕伉墓〉，《考古》，1998 年 5 期，頁 45-49。

62 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合肥北宋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 年 3 期，頁 26-38、70。

63 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興竹宋墓〉，《文物》，1990 年 3 期，頁 19-23。

64 吳樸，〈介紹上海市博物館所藏的幾方古硯〉，《文物》，1965 年 12 期，頁 55-58。

65 天津博物院，〈鉅鹿宋器叢錄·第一編瓷器題字〉（天津：天津博物院，1910），頁 40-41。

66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南豐縣博物館，〈江西南豐縣桑田宋墓〉，《考古》，1988 年 4 期，頁 318-328。

67 吳樸，〈介紹上海市博物館所藏的幾方古硯〉。

53 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台〉，圖四：4，及「一三 盛唐 陶硯」、「十四 盛唐 陶硯」條。

54 石可，《魯硯》，（濟南：齊魯書社，1979），頁 62。

55 1984 年 4 月河南新鄉市平原路的一小學校園內發現一座曾被盜掘的宋墓，墓中出土數枚唐宋銅錢和四件澄泥硯，其中兩件是箕形硯，其硯首突出裝飾帶；另二件則是抄手硯，其中有一件帶蓋，此墓或為北宋前期墓葬。見傅山泉、王春玲，〈新鄉出土宋代澄泥硯〉，《文物》，1986 年 2 期，頁 96。

56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章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 年 4 期，頁 55、59-66。

57 江陰縣文化館，〈江蘇江陰北宋葛閔夫婦墓〉。

58 林仙庭、侯建業，〈山東牟平縣北頭墓群清理與調查〉，《考古》，1997 年 3 期，頁 50-57。

宋哲宗於紹聖五年六月改元「元符」。

此外，1983年山東濟南市王舍人莊曾出土一件澄泥抄手硯，斜坡狀墨堂，硯背模印「柘溝徐老功夫細硯」陰文楷書銘，梯形硯面的硯尾也有欄；「柘溝」即宋代泗水縣柘溝鎮（今山東泗水縣西北），當時以製作澄泥硯著名⁶⁸。此硯就其形制與質地分析，應是北宋硯。

北宋中後期除了有硯面四邊有欄的抄手硯式外，也出現異形抄手硯，例如出土於安徽合肥的包綬墓（1105，表二：10），墓主人是包拯次子，卒於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十一月七日；墓中出土的長方形抄手石硯不但沒有斜坡狀墨堂，正方形平坦墨堂與橢圓形硯池還分開，中間利用一小渠道相連，便於墨汁流入墨堂。出土時硯面有多層漆皮和木質遺痕，「似為硯盒」⁶⁹。（圖六：6）

如前文所述，遲至南宋中期的紀年墓仍可見到風字硯的身影，但與晚唐、五代的風字硯式並不相同，這類宋代風字硯有墨堂漸趨平坦的趨勢，例如安徽潛山彰法山於1991年5月發掘兩座墓葬，依據出土銅鏡的鏡銘，推測為宋墓，M1出土六件澄泥硯，其中一件首尾高度一致，硯尾下方有兩個橢圓柱狀足，硯池凹陷成槽狀，墨堂不但不是斜坡狀，還微凹下⁷⁰。（圖六：7）而上海福泉山T3M1的土坑木棺墓出土的一件風字硯，硯的首尾皆呈弧線形，墨堂作斜坡狀，出土時仍遺留墨痕，但是平底無足；此墓伴隨出土的文物不多，除了風字硯外，有青釉瓶、鳥獸葡萄鏡和北宋「至道（995-997）」、「（大中）祥符（1008-1016）」元寶，報告撰寫人認為後者可作為墓葬年代推斷的依據⁷¹，其實可再考量有斜坡狀墨堂的風字硯在北宋墓中比較常見的因素，以推斷這座墓葬的時代。

北宋仁宗（1023-1063）以前，曾選用廣東端石雕製出「純薄，上狹下闊，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的端硯，賜史館作為「史院官硯」⁷²，這類硯式無足，墨堂平坦，與上海福泉山T3M1土坑木棺所出土的斜坡狀墨堂的平底風字硯不同，或皆可歸為《端溪硯譜》書中所錄的「平底風字」硯式，宋徽宗宣和（1119-1125）初期曾自「御府降樣造形」，命匠製作平底風字硯⁷³。

68 趙智強，〈介紹兩方陶硯〉，《文物》，1992年8期，頁94。

韓明祥，〈北宋柘溝陶硯〉，《龍語文物藝術》，16期，1992年12月、1993年1月，頁80。

69 安徽省博物館，〈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No. 3（1980），頁154-189。

蘇雲，〈宋包拯長方石硯〉，蔡鴻茹、胡中泰主編，《中國名硯鑑賞》，頁35-36。

安徽省博物館主編，《文房珍品》（香港：大業，1995），頁208。

70 李丁生，〈安徽潛山彰法山宋墓〉，《考古》，1994年4期，頁382-383。

71 上海博物館，〈上海福泉山唐宋墓〉，《考古》，1986年2期，頁135-137。

72 米芾，《研史》，收於《美術叢書》（台北：藝文），4集3輯，頁288-292，「樣品」條。

73 不著撰人，《端溪硯譜》。

宋墓出土的風字硯的硯面與書寫的風字或鳳字的外形極相似，顯示宋人在風字硯式已不流行的情況下對這類硯式的懷念之情。至於「史院官硯」與宋徽宗命匠製作平底風字硯，亦清楚顯現當時官方在尊古、好古情懷下對風字硯式的不捨之情。

五代時抄手硯初問世，多不高，蘇州七子山吳越貴族墓出土的抄手硯高3.7公分，或為楊吳尋陽公主墓出土的端石抄手硯僅發表厚度（1.6公分），就圖版看來，與蘇州七子山吳越貴族墓出土者之高度相近。紀年宋墓出土的抄手硯（下及元初書家鮮于樞墓〔1302，1279南宋亡〕，參閱表二）高度最多僅4公分。目前已發表的北宋紀年墓多於南宋者，相對地南宋紀年墓中出土的抄手硯實例也較少，但是仍有可推斷為南宋（或南北宋之際）墓又出土抄手硯的實例，例如1985年9月廣東潮州出土的劉景墓，其父是北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正奏三甲進士劉允，靖康元年（1126）荐辟為銀青光祿大夫，並賜開國男的爵位，因此劉景之墓可能是北宋末至南宋初年墓葬，墓中出土一件端石抄手硯，硯高僅2.45公分⁷⁴。

出土於浙江杭州北大橋的一座宋墓，報告撰寫人依據墓中出土的龍泉窯青瓷碗的製作特點與劃花紋飾具有南宋龍泉窯碗的風格推測為南宋墓⁷⁵，若再考慮同墓伴隨出土的漆筆架之形制，與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所出土的銅筆架⁷⁶以及南宋史繩祖墓（1274）所出土的青玉筆架⁷⁷之形制相類，以及伴隨出土的銅鏡有「湖州真石念二叔無比煉銅照子」銘文，湖州石家銅鏡乃出現於北宋末，流行於南宋，可知為南宋墓。同墓出土的硯尾有欄、硯池較窄（但非一字池）的抄手石硯雖然未曾發表高度，但從圖版依據所發表的長度與寬度，換算之下高度約為3公分。

十年前曾發表一座出土於浙江蘭溪的宋代夫婦墓，墓中所出土的「及齋」銘抄手硯高3.6公分；這座墓的男墓中出土的三十八枚銅錢均為「明道通寶」（北宋仁宗，1032-1033），但出土的影青瓷碗之紋飾與芒口覆燒工藝，被推定為南宋墓⁷⁸；除此之外，墓中伴隨出土的銅鍍銀盒之紋飾與南宋墓中的剔犀鉤雲紋相似⁷⁹，山形銅筆架與南宋朱濟南墓（1197）出土的銅筆架⁸⁰風格相近，只是後者更精緻。五年前所發表之出土於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畫墓，雖然未曾出土瓷器，但是依據墓中所出的湖州石家銅鏡乃出現於北宋末，流行於南宋，以及「四神」壁畫形象等等因素，推定此墓是南宋墓。墓中出土的抄手石硯硯面作長方形，硯首稍窄，硯池上大

74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潮州北宋劉景墓〉，《考古》，1963年9期，頁499-500、515。

7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橋宋墓〉，《文物》，1988年11期，頁55-60。

76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章同之夫婦墓〉。

77 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11期，頁1004-1011、1018。

78 蘭溪市博物館，〈浙江蘭溪市南宋墓〉，《考古》，1991年7期，頁670-672。

79 嵇若昕，〈中國漆器之研究〉，《豐原漆藝館委託規劃報告書》，1990年，頁25。

80 陳定榮、徐建昌，〈江西臨川縣宋墓〉，《考古》，1988年4期，頁329-334。

下小，硯高有 3.7-4.5 公分⁸¹。（圖六：8）從前述宋代紀年墓或非紀年墓出土的抄手硯，高度皆未曾超過 5 公分。但是陝西省博物館 1957 年曾徵集一件澄泥抄手硯，硯背有楷書銘：「紹聖元年（1094）八月二十八日，大劉希造硯記口（花押）」。硯長 17.2、寬 10.9、高 5.4 公分⁸²。此硯的高度已超過 5 公分，惜非考古發掘出土古物。

已正式報導之科學考古出土宋元抄手硯的高度超過 5 公分的實例似乎並不多，目前所知僅有幾例：有出土於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一處窖藏；有出土於河北定興的一處窖藏；有四川簡陽縣東溪公社園藝場發現之古墓窖藏；有四川廣安縣廣福鄉出土的一處窖藏等。（見下文）

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窖藏情形是在一件灰陶瓮中裝了七十二件文物，其中一件端石抄手硯，長 22、寬 12、高 5.6 公分。雖然報告撰寫人「因為第一，窖藏裡的錢幣，最晚的是宋哲宗的元祐通寶，而不見南宋錢幣；第二，窖藏裡的瓷器（吉州窯、贛州窯、湖田窯仿定窯瓷器），從造型、紋飾和掛釉情況來看，大部分是北宋的，小部分是南宋早期的，而不見南宋中、晚期的」，故而認為「這批器物的窖藏時間應在南宋初年」⁸³。但是近年來四川省雖然發現不少宋元時期窖藏，已公布者也有一定數目，但是報告撰寫人對這些窖藏文物的年代推測往往值得商榷，四川地區考古工作者並且多認為：四川宋代窖藏較多的原因是，南宋時四川為抗蒙前哨陣地，尤其南宋中晚期⁸⁴。然而已有學者在探索四川宋元窖藏資料後，認為四川宋元銅窖和瓷銅合窖有較大可能和道教或當地的民間祭儀有關，這些窖藏文物「或許並非財貨掩埋遺留，而有較大可能與道教等民間祭儀有關」；就目前所發表的資料而言，「器物窖藏特別是瓷器窖多屬宋元時期，而以元代瓷器窖藏的發現頻率最高」；至於宋元窖藏中伴隨出土劍、鏡、燭台或硯等，可能也與當時四川地區流行的道教有關⁸⁵。

除此之外，前述出土於大邑縣安仁鎮的窖藏瓷器中，就所發表的圖版言，一件所謂「繩紋醬釉釜」之造型與韓國新安沈船中所出的贛州窯柳斗罐⁸⁶非常相近，新

安沈船沈沒時間大致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1323 年之後不久⁸⁷。如此一來，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窖藏之下限可晚至元代前期，伴隨出土的端石抄手硯的訂年似應往後推移。此硯硯池細窄似一字，其四隅圓弧，與目前所知宋墓出土的抄手硯之硯池皆不類，後者貯水的硯池多較寬；安仁鎮窖藏出土的抄手硯硯式倒是與 1972 年河北定興的一座窖藏出土的抄手石硯形制相近，後者長 19.9、高 5.7 公分，硯池呈圓角長條形，長 8.2、寬 1.7、深 0.9 公分。定興窖藏有兩件倒扣大缸，石硯、石碗、鐵鍋、銅盆、瓷器等文物置於其中，「在此窖藏南側 5 米，地下 1.5 米深處灰土出瓷片」，其年代與窖藏瓷器相同；瓷片中有八思巴文字符號，依窖藏青瓷碗、高足杯的胎質、釉色、裝飾風格等，訂為元代⁸⁸。因此，四川大邑安仁鎮窖藏中的抄手硯以訂為元代為宜。

另外，1974 年冬季四川簡陽縣東溪公社園藝場發現之古墓，出土六百多件文物，出土的十七件硯台中有東漢風格的扁圓形硯，也有五代、北宋風格的風字硯，更有高台抄手石硯，一件高 8.5 公分，但未曾發表圖版，另一件高 5 公分，用紫色端石琢製而成，硯池呈一字形，因為出土文物除了有東漢風格銅洗、龍虎牌、石硯與宋、元時期製品，例如銅燭台、爐、瓶，為數不少的青釉、影青和白釉瓷器外，「其中銅魚形筆架、Ⅰ式青瓷瓶、Ⅱ式青瓷爐、荷葉蓋罐等具有明顯的元代特徵」，被推斷為元墓⁸⁹。但是這座墓室是漢墓形制，墓中文物與修築墓室時間相差近千年，已被認為是後人利用漢代墓室以為窖藏地點⁹⁰。墓中這兩件高台抄手石硯可能都是南宋末或元代遺物。

1985 年報導的四川廣安縣廣福鄉窖藏中出土銅器近八十件，另有兩件石硯，一圓一方，方者即高台抄手硯，呈豬肝色，硯池邊浮雕紋飾，硯面微凸，長 24、寬 15、高 6 公分⁹¹，惜未曾詳述硯池之寬度，從所發表的圖版看來，硯池較寬，並不是一字形池。雖然報告撰寫人認為是宋代窖藏，但是如前文所述，就高台抄手硯的形制而言，或訂為南宋末至元代為宜。

傳世抄手硯中有不少高台硯，有些還是一字形硯池，多被推訂為宋硯，日人則

81 福建省博物館、三明市文館會，〈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畫墓〉，《考古》，1995 年 10 期，頁 909-914。

82 朱捷元、黑光，〈陝西省博物館收藏的幾件硯台〉。

83 大邑縣文化館，〈四川大邑縣安仁鎮出土宋代窖藏〉，《文物》，1984 年 7 期，頁 91-94。

84 陳黎清，〈峨嵋山市羅目鎮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90 年 2 期，頁 41-42。

85 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區域與網絡—近年來中國美術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大藝術研究所，2001），頁 141-170。

86 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新安海底遺物》（漢城：同和出版公社，1984），頁 104，圖 131。

陳擎光，〈元代福建北部及其鄰近地區所輸出的陶瓷器—試論新安沈船以福州為出口港〉，《故宮學術季刊》，3 卷 2 期，頁 1-38，圖 19。

87 鄭良謨，〈新安發現の陶磁器の種類と諸問題〉，《國際シンポジウム新安海底引揚げ文物報告書》（名古屋：中日新聞社，1983），頁 15-20。

馮先銘，〈南朝鮮新安沈船及瓷器問題探討・七、關於沈船沈沒時間〉，《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香港：兩木，1987），頁 305。

8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興元代窖藏文物〉，《文物》，1986 年 1 期，頁 89-91、95。

89 蜀遲，〈四川簡陽出土的石硯〉，《考古與文物》，1983 年 2 期，頁 48-49。

四川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簡陽東溪園藝場元墓〉，《文物》，1987 年 2 期，頁 82-87。

90 謝明良，〈探索四川宋元器物窖藏〉。

91 李明高，〈廣安縣出土宋代窖藏〉，《四川文物》，1985 年 1 期，頁 67-70。

稱之為太史硯⁹²，甚至於認為：太史硯之名見於清代文獻，乃因與「修史官」有關而有是名，俗稱「有腳風字式」⁹³。這類傳世的高台抄手硯有一定的數量往往有宋代著名文人的款識，其中最負盛名者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傳）北宋 蘇軾 從星硯」。這方硯除《西清硯譜》外，近代中日有關古硯賞鑑或譜錄式書籍曾一再提及，茲不詳細描述，但是其高度達5.6公分，硯池雖非一字形，但也比較細窄，或訂為宋末元代之硯較為適宜。無論如何，其側壁雖然有蘇軾名款與「子瞻」印文，但是絕非北宋中期硯式，更不是大文豪蘇軾生前所用之硯。《西清硯譜》中其他訂為宋硯的高台抄手硯不在少數，需一一進行排比，將另撰專文討論，此處僅先舉「蘇軾 從星硯」為例，稍加論述。

若參考斜坡狀墨堂的箕形硯式與坐具高低有關，則高台硯的使用或與坐具的演變亦有關係。宋代以前以席地而坐為主，雖然晚唐已流行圓墩，但是與書寫的關係如何，仍待研究。宋代雖已逐漸養成垂足而坐的起坐方式，但是椅類尚未完全替代舊習，至南宋時才不論男女全廢席地而坐⁹⁴，由是之故高台硯的使用必須遲至南宋才逐漸發展出來。

考古出土宋硯硯式相當多樣化，有些與抄手硯式有關連，有些獨自發展而成，本文僅針對箕形硯式、風字硯式與抄手硯式之演進與其相關問題進行初步論述，其餘硯式暫不加以討論。

四、考古出土遼金時期的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

就目前所知考古出土的「遼硯」實例，較早的紀年墓是出土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遼耶律羽之墓，墓主人生於唐大順元年（890），與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屬堂兄弟，歷任遼代高官，官至遼東丹國左相；耶律羽之薨逝於遼會同四年（941），年五十二，翌年（942）葬。墓中的隨葬品非常豐富，其中一件銀鑲金「萬歲台」硯盒甚受矚目。

這件硯盒平面略呈梯形，盒身周邊鑿刻忍東捲草紋；盃頂式盒蓋正面下端鑿刻波濤紋，中部模沖騰龍紋，三枝立蓮穿繞於龍身，其中一朵盛開，經龍嘴銜立於龍頭頂部，花蕊之上豎刻「萬歲台」三字，上端鑿刻遠山浮雲與緩緩升起的驕陽；盒

蓋周邊鑿刻牡丹與環形花紋；盒長 18.4 公分、寬 11-13.6 公分、通高 7.6 公分。簡報撰寫人稱：銀盒內收貯一「箕形石硯」⁹⁵。這件石硯應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文具。（圖七：1）

這件「萬歲台」銀盒周邊平齊，故所貯石硯首部亦應呈直線，1999 年夏季這件硯與硯盒在上海博物館「草原瑰寶」特展中展出，曾目見之，墨堂與硯首交接處轉折規整，兩側邊與硯首邊緣成稜角狀轉折，而非槽臼狀，但是兩側邊是否垂下扁平側壁則不可知，故此硯究竟是風字硯式抑抄手硯式，俟考。

在目前所知遼墓出土的硯台中，以箕形硯較多，而且除硯尾外往往沿邊突出裝飾帶；硯首裝飾帶的邊緣或呈二凹弧，或呈三凹弧，亦有呈四凹弧者，兩側邊亦各形成一長凹弧；其上裝飾浮雕捲草紋、梅花紋等⁹⁶。（圖七：2、3、4）遼代初期承繼唐代箕形硯式，一直沿用至遼代中晚期，例如內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壩的 11 號遼墓，雖然並非紀年墓，考古工作者依據墓葬佈局和規模，認為墓主人或與遼代皇室有一定的關係，並依墓室結構和出土文物推斷為遼中晚期墓。此墓中即曾出土一件箕形陶暖硯，而且「此硯有使用痕跡」，工作人員整理時發現硯內有墨跡⁹⁷。即使進入金朝，仍可見這類硯首突出，硯邊與硯首皆飾浮雕紋飾的箕形硯⁹⁸。（表三：6，圖七：5）

至於著名的遼陳國公主夫婦墓（1986 年於內蒙古哲里木盟出土）中所出土的兩件箕形玉硯，形制基本相同，但大小各異（表三：3），大件器體厚重，小者較輕薄，硯面受墨處斜坡平淺，與硯池轉折處也較規整，已近風字硯，但是硯首相當圓弧，仍宜歸為箕形硯，或可視為兩者的過渡型（圖七：6、7）。這類過渡型箕形硯常見於晚唐、五代時期，北宋時已較少見，而陳國公主卒於遼聖宗開泰七年（1018），即北宋真宗天禧二年。

此外，1971 年 8 月在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石小硯，長 14、寬 13、高 4 公分；硯面呈風字形，三邊突出，硯首外邊磨成整齊的三直邊，乃選取整

92 例如：窪田一郎，《硯の知識と鑑賞》（東京：二玄社，1977），頁 68。

北畠雙耳、北畠五鼎，《古名硯鑑賞》（東京：秋山書店，1980），頁 28-29、64-65。

同氏，《硯の歴史》（東京：秋山書店，1980），頁 142、143、184 等。

平井鳳龍，《欽州硯のすべて》（東京：秋山書店，1983），頁 42-43。

北畠雙耳、北畠五鼎，《觀硯錄》（東京：講談社，1984），頁 117-120、141-144。

藤木正次，《硯の辭典》（東京：秋山書店，1984），頁 133。

93 藤木正次，《硯の辭典》，頁 133，「太史式」條。

94 朱瑞膝、張邦煒、劉復生、蔡崇榜、王增瑜，《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8），頁 81-88。

95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阿魯柯爾沁旗文物管理所，〈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 年 1 期，頁 4-32，「萬歲台」銀盒之彩圖在封底裡。

96 敖漢旗文物管理所（郎國用），〈內蒙古敖漢旗沙子溝、大橫溝遼墓〉，《考古》，1978 年 10 期，頁 889-904。推斷為遼代早期墓葬。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 年 8 期，頁 31-39。張世卿墓（1116）。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遼金壁畫墓〉，《文物》，1990 年 10 期，頁 1-19。張世本墓（1093 或 1144）。

97 巴林右旗文化館（董文義），〈內蒙古巴林右旗查干壩 11 號遼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No. 10（1987），頁 177-179。報告撰寫人名此硯為「風字形陶暖硯」。

98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7 年 10 期，頁 13。此墓是紀年墓（1177）。

塊青綠砂岩挖鑿出風字形硯面而成，受墨處呈斜坡狀，平底，底上有鑿痕；此墓中尚伴隨出土定窯系「官」字款白瓷器⁹⁹。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中出土的這件風字形青石小硯或亦可歸入「平底風字」硯式之列。

唐末五代初期在南方已然發展成熟的抄手硯，出土於河北宣化相當於北宋末期的遼墓—仕遼漢人張世卿墓（1116，即北宋徽宗政和六年）中，也出現了。雖然發掘簡報未曾詳述這件抄手硯，僅說是陶硯，從發表的圖版分析，似乎是宋代盛行的澄泥硯，而且硯首所留空間較寬（表三：4，圖七：8）。在遼墓壁畫上所繪的硯式也曾表現出較寬的硯首（見下文），這似乎是遼硯的特色之一。其實更早的遼代開國勳臣韓延徽之後人韓佚墓（997，即北宋太宗至道3年）中，即已出現抄手硯（高3、長15.5公分），出土時硯池內尚留有墨痕¹⁰⁰。這件抄手硯的硯首相當圓弧而未嘗突出，硯面仍具唐代箕形硯之外形。（圖七：9）

除了箕形硯、風字硯與抄手硯，在遼墓中還曾出土墨堂呈斜坡狀的圓形硯。二十多年前在內蒙古敖漢旗（新惠）白塔子的一座遼墓中，即曾出土一件圓形陶硯，出土時硯面上仍積有墨痕，報告撰寫人稱之為「馬蹄形硯台」，但是未曾有進一步的描述¹⁰¹。從線繪圖看來，應是一件圓硯，受墨處呈斜坡狀，硯池在墨堂頂端最低處，沿著硯池邊緣呈馬蹄狀突起，故被稱為「馬蹄形硯台」；其硯背亦呈斜坡狀，並從硯尾向兩側作馬蹄狀突出，以取代箕形硯或風字硯的足。這件圓硯融合了唐代多足圓硯與箕形硯的形制，或可稱為二者的過渡型。（圖七：10）

遼代三彩器在唐代三彩器的基礎下，至遲於遼代中期已開始燒造，遼代晚期已臻成熟¹⁰²。在常見的遼代三彩器中，文具中的硯台是一大項，這些遼三彩硯或作圓形，或作多邊形，多呈高台狀，有的搭配一淺碗，後者或以為洗，是否也可作為暖硯之用¹⁰³？高台狀的三彩硯，正面往往沿邊有一梯形硯面，硯首邊緣呈多邊雲角弧曲（或稱扇形花瓣），墨堂作斜坡狀。就外形言，這類梯形硯面與風字硯的外形關係密切。梯形硯面以外的器面往往飾淺浮雕花草紋，側壁繞飾一圈捲草紋或團花紋等等。

如前文所述，遲至金代的墓葬仍出現箕形硯式，最明顯的實例即是1975年北京通縣M2出土的箕形陶硯，M1墓主為石宗璧，生於遼天慶四年（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卒於金大定十五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大定十七年（1177）葬，

99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遼寧北票水泉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12期，頁44-51。

100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361-381。

101 敖漢期文化館（邵國田），〈敖漢旗白塔子遼墓〉，《考古》，1978年2期，頁119-121。

102 戴鴻文，〈遼代三彩器研究〉，《故宮文物月刊》，18卷8期（2000:11），頁34-49。

M2是石宗璧的女性家屬，根據M1出土的石墓志內容推測，石宗璧之妻為女真貴族。M2出土的箕形陶硯乃模製而成，陶質堅硬，除硯尾外另三邊突出裝飾帶，硯首呈三凹弧，飾淺浮雕兩朵雲紋，間飾梅花紋，兩側邊裝飾帶全飾淺浮雕梅花紋，是相當精緻的一件箕形陶硯。（圖七：5）

除了箕形硯，在金墓中也曾出土風字硯，硯背有刻銘：「歲重慶元龜仲冬，拾貳月中旬三日造。」¹⁰⁴然而因為是早年的發掘（1960年底～1961年底），所發表的圖版並不清楚，仍可知其形制乃硯首圓弧，墨堂呈斜坡狀，硯足自硯尾直接伸出。此外，金代遺址中還曾出土硯背刻「硯臺」二字的實例，卻沒有發表質材¹⁰⁵，雖然有一些考古出土的金代硯臺，但是所發表的資料不多，就目前所知，並未發表金代墓葬或遺址出土的抄手硯，但是北宋北方曾流行使用澄泥抄手硯，遼境的燕雲十六州也曾出現這類硯（例如張世卿墓），金代基本上承繼遼與北宋版圖，境內理應仍有人使用這類硯¹⁰⁶，只是出土資料不豐，或未曾受到當地考古工作人員的重視而未曾特意公布相關資料。

曾有學者討論山西地區金墓隨葬品不豐富之因，乃是與當時只重視營建墓室，而不重視瘞埋隨葬品有關¹⁰⁷。雖然這只是山西地區金墓的現象，或許可以擴及整個金代國境，此或可藉以說明科學考古出土的金代硯臺不夠豐富的另一個原因吧！

五、唐宋遼金時期箕形硯、抄手硯與風字硯的質材

從出土與傳世的資料可以知道，盛唐時期初出現箕形硯時，沿承六朝與唐代陶瓷為硯之主要質材的歷史，仍然以陶硯為主，初期可能尚未使用澄泥硯。澄泥硯也是一種陶硯，但是前者是使用曾經仔細淘洗、過濾的細泥，燒製（包括改製）成硯，且相當耐磨又不十分滲水者；否則，即僅是陶硯¹⁰⁸，若是瓷胎，則是瓷硯。文獻中提及唐代的澄泥硯產地有絳州（今山西絳縣）、虢州（今河南靈寶縣境）。前者見張洎（933-996或997）所撰《賈氏譚錄》書中所記：「絳縣人善製澄泥

103 嵇若昕，〈說「遼硯」〉，《故宮文物月刊》，18卷6期（2000:9），頁36-49。

104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潤磁村的唐宋墓葬〉，《考古》，1965年10期，頁507-510，524。

105 肇東縣博物館，〈黑龍江肇東縣八里城清理簡報〉，《考古》，1960年2期，頁36-42。

106 十餘年前有一農民在犁田時曾於金上京故城白城遺址發現硯背有「濟州和家造」銘的陶硯，惜未曾描述硯式，也未曾發表圖版，不知是否是澄泥抄手硯？見張明友，〈金「濟州和家造」陶硯〉，《北方文物》，1998年4期，頁60。

107 史學謙，〈試論山西地區的金墓〉，《考古與文物》，1988年3期，頁88-92。

108 嵇若昕，〈乾隆朝澄泥硯的研製〉，《故宮學術季刊》，5卷1期（1987秋季），頁57-76。

硯，……。」¹⁰⁹ 後者見高似孫所撰《硯箋》：「號澄泥唐人以為第一」¹¹⁰，而且唐代杜佑（735-812）《通典》上記載：號州歲貢「硯瓦十具」¹¹¹。或許是報告撰寫人對陶硯質地未曾十分重視，所正式報導的唐代箕形陶硯或風字陶硯往往未曾仔細分辨是澄泥硯，抑或僅為一般陶硯，目前僅知出土於洛陽隋唐東都城遺址的龜形殘硯，因「質地細膩堅硬，是為澄泥硯」¹¹²。今知唐代龜形陶硯流行於盛唐、中唐時期，或可晚至晚唐（見本文之後記）。號州產澄泥硯或可早至盛唐，絳州產澄泥硯之時間是否可早至盛唐，仍有待進一步探究！但是，因為張洎初仕南唐，任知制誥中書舍人，於宋太祖開寶三年（970）入使宋朝，與宋朝大臣賈黃中（941-996）時相往返，賈黃中在宋太宗時累官至參知政事，史稱他多知臺閣故事，《賈氏譚錄》所述多為唐代軼聞；故而晚唐時期絳州應已能產製澄泥硯，是否能早至中唐或盛唐，俟考！

唐代澄泥硯產地除了絳州、號州之外，青州（山東益都）所產的「石末」硯，有日本玩硯人士以為是澄泥硯¹¹³，唐代大書家柳公權（778-865）「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黑硯次之」¹¹⁴。不知他將青州石末硯與絳州澄泥黑硯相提並論，是否即可認為青州石末硯也是一種澄泥硯？

雖然唐代比較常使用陶或澄泥箕形、風字硯，但在中、晚唐時也開始重視石硯，甚至也開始注意石質的細緻與發墨的特性，在文獻方面，流傳至今的僅知唐代文人已注意到端石（產於廣東肇慶一帶）的優點，並曾一再撰文歌頌之，例如詩人李賀（790-816）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¹¹⁵，劉禹錫（772-842）則說：「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¹¹⁶。前者乃歌頌端州琢硯工藝，後者

則描述端石硯受人重視的情形。除了劉禹錫，皮日休（?-880）、陸龜蒙（?-881）等人也曾獲贈端石硯¹¹⁷，當時「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¹¹⁸。目前報導中尚缺唐代紀年墓出土端石硯的資料，但是非紀年唐墓已發現端石硯了¹¹⁹。至於與端石並埒類比的歙石（產於安徽歙縣一帶），在文獻中需遲至五代南唐李氏國主的偏愛與派硯務官管理，才正式出現在文字史料中。但是在此之前，歙石已被發現，有說是唐代開元年間（713-741）獵人葉氏所發現¹²⁰。無論如何，在安徽合肥的一座中唐末年的船形磚墓中已發現歙石硯。

降及宋代，端、歙、澄泥與洮河石硯名列當時四大名硯，宋代澄泥硯的產地相當多，根據文獻或傳世與出土宋硯的硯銘，當時澄泥硯的產地除了絳州、號州外，還有相州（今河南安陽附近）¹²¹、澤州（今山西晉城縣境）¹²²、山東柘溝鎮與河北省滹沱河北岸¹²³，這些地點大多在中國北方，而且多在河水沿岸。

相對於兩宋，北方遼、金境內雖然也曾發現玉石質硯，但是陶硯的比率相對高多了，其中澄泥硯使用的頻率如何，則因已報導的資料不夠完備，無法論斷，但相信仍應有一定比例，尤其遼境的燕雲十六州境與金代境內原北宋國土所在。至於其他富庶的遼境，也見澄泥硯的使用，1981年就曾報導一件出土於內蒙古昭盟巴林右旗遼代慶州古城遺址的澄泥硯，硯並非箕形、風字或抄手硯式，而作八邊形，橢圓形墨堂，面微凸，硯池近硯首一端呈多曲弧狀扇形，墨堂背面深陷成槽，中間偏上有兩行凹印硯銘：「西京仁和坊李讓羅土澄泥瓦記」¹²⁴。慶州是遼聖宗太平十一年、興宗景福元年（1031）秋七月所建，即今內蒙古昭盟巴林右旗，遼代西京即今山西大同。至於在金代國境出土的澄泥硯也不乏其例，1978年北京通縣金代墓葬曾出土澄泥三足圓硯，硯背有十九字銘¹²⁵；1998年曾發表金上京故城白城（北城，吉林會寧）出土的澄泥硯，硯背有「濟州和家造」硯銘，因未曾發表圖版，也未曾描

109 張洎，《賈氏譚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景印），第1036冊，頁131。另在《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景印），16編1冊，也收錄此書，頁216僅云「州縣人」。但是宋人高似孫、明人陳繼儒等分別傳抄此則記錄時皆指出是「絳人」或「降縣人」，前者見高似孫，《硯箋》，卷三，頁125；後者見陳繼儒，《眉公雜著（二）—珍珠船》（台北：偉文，1977），卷四，頁621。

110 高似孫，《硯箋》，卷三，頁124。

111 杜佑，《通典》，《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3冊，頁61。

112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隋唐東都城遺址出土一件龜形澄泥殘硯〉，《文物》，1984年8期，頁63。

113 北畠雙耳、北畠五鼎，《中國硯材集成》（東京：秋山書店，1981），頁36。

114 劉昫等，《舊唐書》（台北：商務，百衲本），〈列傳〉，卷115，頁15475，「柳公綽傳弟公權附傳」條。

115 李賀，「楊生端州青花紫石硯歌」，全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刊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薰。乾膩薄重立腳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碩何足云。收於高似孫，《硯箋》，卷4，頁129。

116 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界書局景印），第363冊，卷24，頁124。

117 皮日休，「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與陸龜蒙，「裴美以紫石硯見贈以詩迎之」，收於二氏，《松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32冊，卷6，頁232。

118 李肇，《唐國史補》，《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35冊，卷下，頁447。

119 劉濱良，〈端硯淺談〉。

120 江光啓，「宋姪濟舟售硯序」，收於《新安文獻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5冊，卷19，頁269-271。

121 米芾，《硯史》，《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3冊，頁69。

122 何蓮，《春渚記聞》，《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卷九，頁523-524。

123 蔡鴻茹，〈澄泥硯〉，《文物》，1982年9期，頁76-77，文中引一方宋代澄泥硯，硯銘：「滹陽劉萬功夫法硯」。

124 成順，〈遼慶州古城出土「西京古硯」〉，《文物》，1981年4期，頁38。

125 魯琪，〈通縣唐大庄出土金代陶硯〉，《文物》，1981年8期，頁90。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收藏一件與這件金代陶硯形制相似，銘文相同但排列不同的澄泥三足圓硯。見林伯亭主編，《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台北：故宮，2000），頁454，「澄泥圓硯」條（嵇若昕撰）。

述硯式，不知其形制，金代有兩個濟州，一在山東濟寧，一在吉林農安，報導人認為此硯銘之濟州是後者，上京與其相距 410 里（古驛站里程），「此陶硯的出土或許可以證明有商業作坊或是該硯製作於濟州，被當時學人帶至上京會寧府」¹²⁶。已報導的資料雖然零星，但是仍可知在遼金國境內仍然有製作澄泥硯的作坊。

六、結語

雖然盛唐時期已出現箕形硯式，但是此時多足圓硯仍然是當時硯式的主流，中唐時期多足圓硯（尤其是辟雍硯）的發展達於高峰，但是也在此時箕形硯逐漸取代多足圓硯（包含帶足方硯）在文房用具中的地位，晚唐以後除了懷古心情之外，基本上這類帶足圓硯或方硯已不易見到，所以南唐宋初文人蘇易簡雅好文房用具，在輯錄《文房四譜》時錄及東漢末年繁欽「硯頌」描述當時三足圓硯是「效羲和之毀隅，鉤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妙用兮，御几硯而優遊」¹²⁷時，忍不住指出：「今絕不見三足硯」¹²⁸，不過多足圓硯仍以「古硯」之姿偶有所見。

箕形硯與帶足圓硯或方硯的形制頗有差距，其間演化的軌跡不易探究，但是近年大陸的唐華清宮考古隊在陝西臨潼縣唐代華清宮梨園遺址中，曾發掘出一件圓形陶硯，硯面有橢圓形硯池，但是器身一半是實心，一半自器底凹陷¹²⁹。華清宮梨園始建於開元二年至十一年之間（714-723），擴建於天寶二年（743），即在盛唐偏晚時期，這方帶池無足圓形陶硯應是盛唐晚期或稍晚的遺物，從器形而言，可說是多足硯發展成箕形硯的過渡形制。（圖八：1）此外，前述二十多年前出土於內蒙古敖漢旗白塔子的一座遼墓中的「馬蹄形硯台」，雖然是一件圓硯，受墨處卻呈斜坡狀，硯池在墨堂頂端最低處，沿著硯池邊緣呈馬蹄狀突起，其硯背亦呈斜坡狀，並從硯尾向兩側作馬蹄狀突出，以取代箕形硯或風字硯的足。這件圓硯融合了唐代多足圓硯與箕形硯的形制，也可作為二者過渡型的參考。（圖七：10）

中唐時期是箕形硯式逐漸往風字硯式演進、發展的階段，晚唐時期發展出了真正的風字硯，唐末五代時的硯式又進一步發展出抄手硯，至於風字硯在五代時期也出現平底風字硯式。此時遼境繼承唐代箕形硯式，卻更偏好除硯尾外往往沿邊突出裝飾帶的箕形硯；遼代箕形硯硯首裝飾帶的邊緣或呈二凹弧，或呈三凹弧，亦有呈四凹弧者，兩側邊亦各形成一長凹弧；其上裝飾浮雕捲草紋、梅花紋等。

126 張明友，〈金「濟州和家造」陶硯〉，《北方文物》，1998 年 4 期，頁 60。

127 繁欽，《初學記》，收於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北京：中華，1985），卷 55。

128 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收於《筆記小說大觀》，6 編 4 冊，卷 3，頁 2287-2295。

129 唐華清宮考古隊，〈唐華清宮梨園、小湯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9 年 3 期，頁 25-42。

當抄手硯式逐漸取代風字硯式的時候，宋人好古、尊古，對於具有二足（或一足）的風字硯式呈現懷古之情，宋墓出土的風字硯的硯面與書寫的風字或鳳字的外形極相似，即顯示出宋人在風字硯式已不流行的情況下對這類硯式的懷念之情。此外，抄手硯式的硯面多呈梯形，在北宋也發現硯面與書寫的風字或鳳字外形相似的抄手硯，當時或亦稱為風字硯。

唐末五代出現硯面呈梯形的抄手硯，是從風字硯發展而成，山東牟平北頭 M1 曾出土一件風字石硯，硯面外形為梯形，斜坡狀墨堂遺留墨跡，硯背四隅各有一個 L 形寬平足¹³⁰，似可作為風字硯式發展成抄手硯式的過渡形制。（圖八：2）北頭 M1 出土的文物不多，除了石硯外也出土了「祥符元寶」（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此外尚有影青蓮花碗，乃十瓣花式口，故而這是一座宋墓。

初期的箕形硯多陶質，風字硯有陶製也有石製，風字陶硯中不乏澄泥硯，但是中、晚唐以來文人往往重視著名的石硯材，蘇易簡即曾指出：「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郎官樣。連水滴器於其首而為之者，穴其防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于硯中。」¹³¹蘇易簡所描述的石硯，如規整的馬蹄形硯、多曲弧邊的蓮葉形硯都已在遼硯中發見；當時圭的形制是尖首長條形，璧形則作扁圓形，「上圓下方如圭如璧者」不知是否是指稱當時硯首曲弧的風字硯式？至於圓盤形的辟雍硯（或稱分題硯），雖然是初唐、盛唐至中唐中期常見的硯式，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而所謂中腰微凹的郎官樣，應該就是硯面外形作書寫的風字或鳳字外框的風字硯或抄手硯。

蘇易簡最後所描述帶有「水滴器」並以「穴」連接硯池與墨堂的硯式在江蘇鎮江的北宋中後期墓葬也有實例可供參考。1979 年 11 月，鎮江烏龜山發掘一座墓葬（M1）出土 347 枚銅錢，年代最晚的是北宋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1）之後所鑄，雖然報告撰寫人認為「故墓當距天聖年間不遠」¹³²，但是伴隨出土的銅鏡有「湖州石八郎煉銅照子」銘，湖州石家銅鏡出現於北宋，流行於南宋，則此墓訂為南宋墓或較恰當。墓中出土的葫蘆形端硯琢磨精緻，刻工精巧，橢圓形墨堂呈斜坡狀，其上方有一幾乎滿月形硯池，池內留粗鑿痕，邊刻平行淺紋，池蓋雕飾纏枝菊花，花心鏤一小孔；墨堂與硯池間有一隔牆，下方留有一小孔連通墨堂與硯池。長 17.2、寬 8.2-13.9、高 3.3 公分。（圖八：3）雖然不是風字硯或抄手硯，但是斜坡式的墨堂卻可知其關係密切；前述包綬墓中出土的異形抄手硯也是此類有「穴」以連接硯

130 林仙庭、侯建業，〈山東牟平縣北頭墓群清理與調查〉。

131 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

132 鎮江市博物館，〈鎮江宋墓〉，《文物資料叢刊》，No. 10（1987:3），頁 162-170。

池與墨堂的硯式。另外，1995年安徽六安市州鋪鎮棗樹村北宋墓出土的「蟬形青花端硯」，硯首為葵花形池，內刻波浪紋，其中浮雕一魚。斜坡式墨堂的首端作三瓣花式。墨堂與硯池之間有一長方形水槽（長4.4、寬1.9、深1.5公分），內有一孔與硯池相通。水槽上有蓋，蓋面正中一活眼，兩側刻纏枝花紋。全器石質細膩，刻工精細¹³³。此硯可與前述葫蘆形端硯規為同一類。

唐宋文人重視石硯材的發墨而不損筆，端、歙二石獨占黿頭，但在唐代尚有河南虢州稠桑所產的紫石硯也相當受到重視¹³⁴。出土或傳世中、晚唐的紫石硯中，除了端石外，或當有稠桑硯吧！

唐末五代開始使用抄手硯，宋代抄手硯出現的頻率比風字硯多，初期抄手硯的墨堂為斜坡狀，北宋中後期（十一世紀後半葉）抄手硯的墨堂漸趨平坦，硯池凹陷，硯面也由梯形逐漸變成長方形。南宋的風字硯與抄手硯之墨堂基本已平坦，硯池深陷，初期硯池較寬，後來漸趨細窄，元代抄手硯則出現一字池。至於高台抄手硯也需遲至南宋末方始出現，元代漸趨流行。

唐代與五代的箕形硯或風字硯之硯尾無邊欄，作開口狀，隨著墨堂的漸趨平坦，北宋中後期也出現硯面四邊有欄的抄手硯式，南宋的抄手硯（包含風字硯）硯尾或開口，或有邊欄，二者並行不悖。

遼境內以箕形硯居多，而且除硯尾外三邊多突出曲弧形裝飾帶，至於風字硯與抄手硯也不乏其例。至於遼三彩高台硯，外緣或作圓形，或作多邊形，墨堂作斜坡狀，硯首邊緣呈多邊雲角弧曲（或稱扇形花瓣）。這類三彩遼硯的硯面與風字硯式關係比較密切。金代出土之硯受限於資料的貧乏，雖然也曾發現箕形硯與風字硯，但是抄手硯比較少見。遼、金之硯的質材雖然也有玉石製者，但以陶硯為數較多，其中不乏當時流行的澄泥硯。

北宋對於箕形硯、風字硯之名稱莫衷一是，而無抄手硯之名。北宋中期的米芾對於帶有兩足而硯面外形似書寫的鳳字外框的硯式，雖然一般人稱為風字硯，他獨排眾議，堅持名之為「鳳皇池」硯。從考古出土實例可知：五代已出現平底風字硯，北宋中後期則見平底長方形硯的實例¹³⁵，雖然上海福泉山T3M1北宋土坑木棺墓出土之平底風字硯，墨堂仍作斜坡狀，文獻上卻說明：北宋中、後期官方曾一再

133 許玲、馮志余，《中國文物精華》（北京：文物，1997），頁251，「144 蟬形青花端硯」條。

134 李匡義，《資暇集》，轉引自蘇易簡，《文房四譜·硯譜》，〈二之造〉。

135 出土平底長方形硯的紀年墓至少有元豐四年（1081）的徐伯通墓與元祐四年（1089）的侯嚴墓。前者見王慶慶，〈江蘇江寧東善鄉馮村清理二座北宋墓〉，《考古學報》，1959年1期，頁46-47。後者見滄水宋墓考古發掘隊，〈滄水縣城關鎮北宋石室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9年3期，頁11-17。

製作石質的平底風字硯。採用風字外形作為硯的外形，充分表現宋人對昔日硯式的懷念之情，至於以平底取代硯足，或與此時已相當重視石硯材，石質之硯若再鑿雙足，製作工藝比陶硯費工與費時，而且此時垂足而坐的情形應比宋初普及，故而墨堂也漸趨平坦。

契丹人與女真人多住穹廬（帳篷），即使有桌椅，也相當低矮，故而具有斜坡狀墨堂的箕形硯在遼境與金境使用的時間相對地比較長久，當宋境已較盛行平坦墨堂的硯式時，遼境仍較常使用斜坡狀墨堂的硯式，金境則因接續北宋傳統，雖然仍可見斜坡狀墨堂的箕形硯，但是平坦墨堂的硯式應仍是當時主流。

科學考古出土的宋硯，不論是出土於墓葬或窖藏，其硯式相當多樣化，是否已是宋硯硯式的全部，仍值得商榷，若參閱宋人撰述有關硯譜與硯式的書籍或其他文獻，宋硯硯式極富變化。出土的宋硯雖然也見硯銘，但文字不多，比較長的硯銘（超過八字）往往是陶硯（包括澄泥硯），清宮舊藏一些有長銘的石硯，雖然清人定為宋硯，多需仔細比對，其中有一些高度超過5公分的抄手石硯，可能是宋末元代的硯台，還有一些有宋代名人款識的硯，或可能是明代的仿古之作，皆須仔細比對，不能依銘斷代。當然這些清宮舊藏所謂宋硯，亦不乏確為宋硯，本文所提到的「澄泥圓硯」（見註125），與1978年北京通縣一座金代墓葬所出者形制相似，銘文相同，雖然排列不同，依然是一件無疑問的北宋末至南宋或金代的澄泥三足圓硯，但它原是中央博物院的收藏，中央博物院播遷來台的運台文物以原「古物陳列所」的藏品為主，該所文物原藏清代內府，乾隆朝分儲於奉天、熱河兩行宮¹³⁶，故依然原本是清宮舊藏，但是這件澄泥圓硯是否即是其中之一，仍待確認。《西清硯譜》所錄宋硯、目前並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者，有一件澄泥抄手硯，雖然原所鐫「南軒老人寫經硯」銘不一定可斷定是宋人張栻¹³⁷，但它是一件澄泥抄手硯，硯面呈梯形，硯尾有欄，墨堂微呈斜坡狀，硯池約佔硯面三分之一，其形制與本文所述之1983年山東濟南市王舍人莊出土的澄泥抄手硯相似，應是一件北宋硯。由此可知，傳世所謂宋硯，或許必須一一審慎排比，方能有比較確定的訂年。

後記

唐代箕形硯中以隔欄區分墨堂與硯池的硯式，應是其支系，目前所知者除了有前述三例外（前文第二節倒數第二、三段），最常在箕形硯的另一支系—龜形硯見

136 譚旦同，《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經過》（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0），頁38-39，257-259。

137 鄭家瑋，《西清硯譜古硯特展》（台北：故宮，1997），頁98-100。

到。目前已發表的龜形陶硯至少已有十一件（表四），墨堂或有欄，或作斜坡狀，也有凹陷的墨堂者，龜首或曲或直，更有作回首飲水狀，以及交頸交尾雙龜形，至今尚未發表出土於紀年墓的龜形硯，依據伴隨出土物或墓葬狀況等，有兩件被推訂為盛唐之硯¹³⁸（表四：4，6）。依據目前資料，箕形硯最早在盛唐時期出現，故而1985年出土於湖南郴州一座水井的殘龜硯（表四：8），雖然根據出土物，水井的上限可早到隋末，下限晚至中唐時期，但是這件殘龜硯只可訂為盛唐或中唐之硯¹³⁹。同理，被推訂為唐代早期的出於河南洛陽灰坑的龜形澄泥殘硯¹⁴⁰（表四：7），其時代也應往下推移。無論如何，這類龜形硯應該都是盛唐或中、晚唐的唐硯，三十多年前發表的硯史資料曾將其訂為漢硯，（表四：1，2，3）並且說：「據長期研究硯史的人，擅長複製古物的老技工，以及日本有鄰館藏一陶龜硯，都認為係漢代文物」，作者接著提及河南上蔡縣城東南唐墓出土的陶龜硯（圖九：1），但是作者因「未見實物」，故預留伏筆表示「尚須進一步研究」¹⁴¹。如今已可確定其皆非漢硯¹⁴²。

除了龜形硯，同樣發表於三十多年前的硯史資料之一件箕形陶硯，其硯池作二曲蓮瓣形裝飾，硯首突出的裝飾帶外緣呈二凹弧，飾菱格紋，兩側邊先內縮後尾端外撇，浮飾雲紋，原訂為隋硯¹⁴³，今亦需改為唐硯，而且是晚唐之硯，下限可至遼金時期。

此外，在同一篇的硯史資料中也發表了一件十二峰陶硯，與龜形硯並稱為「漢代陶硯」，但因「此種陶硯，不詳其為何地出土，觀其硯形，山形、水滴，特別是人像之塑造和風格，似為西漢文物」；而且全器「結構之奇特，從未見諸任何著錄。也未見有二，實為陶硯中之孤品」¹⁴⁴。由於是三十多年前的資料，有如是論述，可予理解，不過數年前已有學者提出反駁，認為此器上的人像與「漢代雕塑的面形、體形與肌肉型態的表現」皆不相同，「在未見類似的漢硯出土之前，把它定為唐代之作是比較妥當的」¹⁴⁵，似乎仍然認為這件十二峰陶器是一件陶硯。

13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上蔡縣賈莊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2期，頁63-65。

中科院考古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1966），頁62。

139 郴州地區文物工作隊，〈湖南郴州發現唐代水井〉，《考古》，1987年2期，頁114-118。

140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隋唐東都城遺址出土一件龜形澄泥殘硯〉，《文物》，1984年8期，頁63。

141 冶秋，〈刊登硯史資料說明〉，《文物》，1964:1，頁49-52，圖版參、肆、伍。

142 鄭珉中，〈對兩漢古硯的認識兼及誤區的商榷〉，《故宮博物院院刊》，1998年4期，頁17-24。文中已對這類陶龜形硯之製作時代重新商榷，確定其為「唐代的製作」，但未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143 《文物》，1964年3期，〈硯史資料（三）〉，圖版拾。

144 冶秋，〈刊登硯史資料說明〉。

145 鄭珉中，〈對兩漢古硯的認識兼及誤區的商榷〉。

在出土為數不少的唐三彩器中，有一類所謂「池」的陶器，往往作層層山巒，怪石嶙峋，草木茂盛，數鳥棲息，山巒前平展出一水池，比較早的報告有1960年《考古》發表的一件三彩器，出土於陝西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報告中歸之為「建築模型：假山」¹⁴⁶，近人李知宴在1989年出版的《中國釉陶藝術》中也指出：這類三彩器「在唐墓出土的三彩建築群模型中，它屬於美化庭園的設施。」¹⁴⁷但是，前者（1960年發表的三彩假山）在第二年的《文物》中已說是「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之）三彩硯」，而且是當期的封面¹⁴⁸。至於李知宴在《中國釉陶藝術》認為是建築模型的三彩器，他在1986年發表的文章中卻說是「生活用具」中的「洗」¹⁴⁹，前後似乎矛盾。1985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在唐長安城西明寺遺址曾出土「殘陶硯3塊」，一塊是箕形硯的殘塊，一塊是龜形硯的龜首與一只足，還有「一塊大型的須彌山硯，……水盂旁有假山和插筆的圓孔，硯面上留有墨跡」¹⁵⁰。池內留有墨跡並不表示它就必須是硯，若是文房用具中的水盛類文具，不正合適！前述的十二峰陶器或即是唐代的陶水盛。

146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60年3期，頁34-38。

147 李知宴，《中國釉陶藝術》（香港：兩木，1989），頁72，「113 三彩山水池」條。

148 《文物》，1961年3期，封面說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硯」。

149 李知宴，〈唐三彩生活用具〉，《文物》，1986年6期，頁76-80、86。

150 中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1期，頁45-55。

表一 紀年唐、五代墓出土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參考表

編號	墓主	出土地點	紀年 (西元)	出土 硯數	質材		形制					尺寸 (公分)			備註
					石	陶	箕形硯	風字硯	抄手硯	足數	足形	長	寬	高	
1	梁元珍	寧夏固原	聖歷二年 (699)	1		○	○			2	撇足	10.4	7.8	2.2	墓志：世代望族；硯呈橢圓形，內有墨跡
2	張思忠夫婦	河南偃師	夫長壽二年(693)卒、妻長安三年(703)卒	1		○	○					21.4	20	10.2	墓志碑；暖硯，附水盂與筆槽，磨墨處作箕形硯面
3	宋禎	河南偃師杏園村	神龍二年(706)	1		○	○			2	長方足	15	10	4.2	石墓志：官至四品；硯首有裝飾帶
4	張九齡	廣東韶關羅源洞	開元二十八年(740)卒，數十年後葬	1		○	○			2		20.5	18.3	5	墓志；底刻「拯」字，張九齡之子張拯
5	鄭炅	河南偃師南蔡莊	開元九年(721)，天寶十三年(754)葬	1		○	○			2		13		2.5	墓志：開元九年(721)卒，754遷葬
6	劉姓夫婦	河南平頂山苗侯	天寶十一年(752)卒，天寶十三年(754)葬	1		○	○			2	乳丁足				墓志：歷任縣尉，夫745、婦752卒；硯池飾蓮瓣紋
7	鄧俊(?)	湖南益陽七里橋	寶應二年(763)	1		○	○			2	長方足	14.5	前13；後10.8	前3；後1.5	青碑墓志；依線繪圖，似硯首較寬而低，所示尺寸前或為硯尾
8	鄭洵夫婦	河南偃師杏園村	大歷十三年(778)	1		○	○			2	五邊柱狀足	8.6	6.4		墓志：妻王氏為宰相王方慶曾孫女
9	?夫婦墓	河南洛陽	男墓主入葬乾元二年(759)，女墓主入葬興元二年(784)	1		○	○			2	錐形足	24	19	4.5深2	
10		南京錢家渡丁山	貞元元年或三年(785,787)	1		○	○			2	乳丁足	8	6.2	後高1.8	墓志漫漶

表一 紀年唐、五代墓出土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參考表(續)

編號	墓主	出土地點	紀年 (西元)	出土 硯數	質材		形制					尺寸 (公分)			備註
					石	陶	箕形硯	風字硯	抄手硯	足數	足形	長	寬	高	
11		河南洛陽	元和元年(806)	1		○		○(?)		2					陶墓志；灰陶硯有墨跡
12	王斌	山東寧津	元和九年(814)	1		○	○			2	圓錐形足	8.8	6.8	3	墓志；灰陶硯面有墨跡
13	M5	河南陝縣劉家渠	開成三年(838)	1	○										墓志；無描述、尺寸或圖
14		安徽合肥	開成五年(840)	1	○歙石		○			2	長方足	21	11-15.1	3.5	墓志：一隱士，姓名不辯
15	伍鈞	安徽巢湖市環城鄉	會昌二年(842)	1	○			○		2	長方足	14.1			石墓志；紫石質細
16	李郁	河南偃師杏園村	會昌三年(843)	1	○		○			2	長方足	16.6	12.3	5.3	墓志；形制規整，打磨光滑
17	李存	河南偃師杏園村	會昌五年(845)	1	○		○			2		15	11		墓志；紫石堅硬，打磨光滑
18	李悅	河南偃師杏園村	咸通十年(869)	2		○	○	○		2	圓柱狀足	箕9.2；風9.8			墓志；曾授國子監選修等官，死於難
19	高繼蟾	河南洛陽	後梁開平三年(909)	1		○		○		2	長方足	14	10.1	2.7	墓志：生前任教坊使；硯內有墨跡
20	(楊吳)尋陽公主	江蘇邗江蔡莊	楊吳乾貞元年(927)卒，大和元年(929)葬	1	○端石				○			12	3	厚1.6	推測為楊吳楊行密之女；硯內殘存墨跡

出處：

- 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3期，頁1-9。
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博物館（羅豐主編），《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1996），頁117-135。
- 偃師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南偃師縣隋唐墓發掘簡報〉，《考古》，1986年11期，頁993-999。
- 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年5期，頁429-457。
-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唐代張九齡墓發掘簡報〉，《文物》，1961年6期，頁45-49。
- 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唐墓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95年1期，頁14-31。
- 平頂山市文管會，〈河南平頂山苗侯唐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年3期，頁27-28。
- 益陽縣文化館，〈湖南益陽縣赫山廟唐墓〉，《考古》，1981年4期，頁315-318。

8. 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 年 12 期，頁 1-23。

9. 洛陽市博物館，〈洛陽市十五年來出土的硯台〉，《文物》，1965 年 12 期，頁 37-50。

10.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錢家渡丁山發現唐墓〉，《考古》，1966 年 4 期，頁 227-228。

11. 王與綱、趙國璧，〈洛陽十六工區清理唐墓一座〉，《文物》，1956 年 12 期，頁 77。

12. 呂來生、王玉芝，〈山東寧津發現紀年唐墓〉，《考古》，1993 年 10 期，頁 950-958。

13. 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一九五六年河南陝縣劉家渠漢唐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7 年 4 期，頁 9-21。

14. 合肥市文管處，〈合肥市發現明代瓷窖藏和唐代邢窯瓷〉，《文物》，1978 年 8 期，頁 52-53。

安徽省博物館主編，《文房珍品》（香港：大業，1995），頁 206。

15. 巢湖地區文物管理所，〈安徽巢湖市唐代磚室墓〉，《考古》，1988 年 6 期，頁 522-527。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唐墓的發掘〉，《考古》，1996 年 12 期，頁 1-23。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 年 10 期，頁 904-914。

18. 中科院考古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杏園村六座紀年唐墓〉，《考古》，1986 年 5 期，頁 429-457。

1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文物》，1995 年 8 期，頁 52-59。

20. 揚州博物館，〈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清理簡報〉，《文物》，1980 年 8 期，頁 41-47。

表二 紀年宋墓出土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參考表

編號	墓主	出土地點	紀年 （西元）	出土硯 數	質材		形制					尺寸（公分）			備註
					石	陶	箕形硯	風字硯	抄手硯	足數	足形	長	寬	高	
1	M2	江蘇連雲港	北宋真宗 (998-1022)	1		○		○		2	矮小足	13.2	8.4	3.0	依伴出銅錢推測
2	劉宗	江西彭澤	慶曆七年 (1047)	1	○										無說明
3	葛閏	江蘇江陰	皇祐元年 (1049)進士	2	○?				○			弧 14； 平 12	平 7-8	弧 4；	墓志；一弧首縮腰，一平首直腰；質材失記
4	劉十三郎	江蘇無錫	嘉祐七年 (1062)	1	○				○			15.4	3-10	2.9	買地券
5	田三郎夫婦	湖北英山縣大屋脊	熙寧十年 (1077)	1		○			○			12	7.3- 8.1	2.7	地券；墨池內有墨痕
6	謝文詣	湖北英山縣郭家灣	熙寧十年 (1077)	1	○				○			13.9	8- 8.4	2.3	地券；長橢圓形硯面，墨池內有墨痕
7		浙江武義縣	元豐六年 (1083)	1		○			○			11.2	7		灰陶筒形器腹壁刻銘
8	曾鞏 (1019-1083)	江西南豐	元豐六年 (1083)	1	○				○			11.3	11.4	1.8	
9	李彬	江蘇溧陽縣竹簀	元祐六年 (1091)	1	○				○			22.2	12.6- 14.2	4	墓志；平面墨堂，池連凹斜
10	包綬	安徽合肥大興集	崇寧四年 (1105)	1	○				○			17	10.8	2	墓志；長方形硯，硯面由橢圓形池與正方形墨堂組成，有一小流相接
11	孫大郎	江西金溪	大觀二年 (1108)	1	○				○			10.5	6.4- 6.9	1.2- 1.4	買地券；硯面四隅各刻一卷曲紋
12	慕伉	山東棲霞市慕家店	政和六年 (1116)	1	○				○			面 19.7 底 18	面 12- 12.7 底 11.6 -12.3	2.8- 3.1	墓志
13	馬紹庭夫婦	安徽合肥	重和元年 (1118)	2	○端與歛各一			○端石				19.2	12.6- 13.2	3.4	石墓志：「政和戊戌」，乃政和九年，同年十一月改元為重和；端石抄手硯出於男棺，女棺所出歛石硯硯面作長橢圓形

表二 紀年宋墓出土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參考表（續）

編號	墓主	出土地點	紀年 （西元）	出土硯數	質材		形制					尺寸（公分）			備註
					石	陶	箕形硯	風字硯	抄手硯	足數	足形	長	寬	高	
14	張同之	南京市江浦	慶元元年 (1195)	2	○端歟各一			○端石		2		13.3	8.8-10.7	1	墓志：歟硯為橢圓平底，伴出墨二錠、銅水盂、銅鎮紙、銅筆架、銅印
15	許峻 (1242-1272)	福建福州茶園山	咸淳八年 (1272)	1	○端石				○			16.7	10.2	厚1.8	石墓志；硯池內殘留餘墨
16	馮道真	山西大同	元至元二年 (1265)	1	○(?)				○			19.5	12-13.5	2-2.5	葫蘆形硯池，質材失記
17	鮮于樞 (1257-1302)	浙江杭州	元大德六年 (1302)	1	○端石				○			7.8	4.8	厚1.8	淺抄手，硯池一端有一石眼

出處：

1. 南京博物院、連雲港市博物館，〈江蘇連雲港市清理四作五代、北宋墓葬〉，《考古》，1987年1期，頁51-57。
2.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彭澤宋墓〉，《考古》，1962年10期，頁539。
3. 江陰縣文化館，〈江蘇江陰北宋葛閻夫婦墓〉，《文物資料叢刊》，No 10（1987），頁38、171-174。
4. 馮普仁，〈無錫市錫惠橋北宋墓〉，《考古》，1986年12期，頁1140-41。
5. 黃岡地區博物館、英山縣博物館，〈湖北英山三座宋墓的發掘〉，《考古》，1993年1期，頁28-36。
6. 同前註。
7. 李知宴、童炎，〈浙江省武義縣北宋紀年墓出土陶瓷器〉，《文物》，1984年8期，頁81、91-93。
8. 許智范，〈南豐讀書岩與曾鞏墓文物〉，《中國文物報》，1995年7月30日，4版。
9. 鎮江市博物館、溧陽縣文化館，〈江蘇溧陽竹簀北宋李彬夫婦墓〉，《文物》，1980年5期，頁34-39。
10. 安徽省博物館，〈合肥東郊大興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No. 3（1980），頁154-189。
蘇雲，〈宋包授長方石硯〉，蔡鴻茹、胡中泰主編，《中國名硯鑑賞》，頁35-36。
安徽省博物館主編，《文房珍品》（香港：大業，1995），頁208。
11. 陳定榮，〈江西金溪宋孫大郎墓〉，《文物》，1990年14期，頁14-18、21。
12. 李元章，〈山東棲霞市慕家店宋代慕伉墓〉，《考古》，1998年5期，頁45-49。
13. 合肥市文物管理處，〈合肥北宋馬紹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年3期，頁26-38、70。
14. 南京市博物館，〈江浦黃悅嶺南宋張同之夫婦墓〉，《文物》，1973年4期，頁55、59-66。
15.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茶園山南宋許峻墓〉，《文物》，1995年10期，頁21、22-33。
16. 大同市文物陳列館、山西雲岡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馮道真、王貞墓清理簡報〉，《文物》，1962年10期，頁34-43。
17.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發現元代鮮于樞墓〉，《文物》，1990年9期，頁22-25。

表三 紀年遼、金墓出土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硯參考表

編號	墓主	族屬	出土地	卒年或入葬年	件數	質材			形制					尺寸（公分）			備註
						石	玉	陶	箕形硯	風字硯	抄手硯	足數	足形	長	寬	高	
1	耶律羽之	契丹	內蒙古赤峰市	會同四年 (941)卒，翌年 (942)葬	1	○				○		？	？	18.4	11-13.6	外盒通高7.6	貯於「萬歲台」銀盒中
2	韓佚	漢	北京市	統合十五年 (997)	1			○			○			15.5		3	弧形硯首，池內有墨痕
3	陳國公主夫婦	契丹	內蒙古哲里木盟	開泰七年 (1018)	2		○		○			2	圓柱足	大：12小：8.5	大：7.1小：4.1	大：2.6-4.1小：2.1-2.8	駙馬蕭紹矩（漢族）合葬
4	張世卿 (M1)	漢	河北宣化下八里	天曆六年 (1116)	2			○	○		○	箕：2	圓柱足				尺寸失記；從圖版看，抄手硯似為澄泥硯
5	張世本夫婦 (M3)	漢	河北宣化下八里	妻焦氏金皇統三年 (1143)卒，翌年 (1144)葬	1			○	○			2	錐足	15.3	6.9		張世本大安四年 (1088)卒，九年 (1093)葬
6	石宗璧家屬 (M2)	漢	北京市通縣	石宗璧於大定十五年 (1175)卒，十七年 (1177)葬	1	○			○			2	錐足				墓志，石宗璧妻乃女真貴族；硯出M2，外緣裝飾帶

出處：

1.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館、阿魯柯爾沁旗文物管理所，〈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年1期，頁4-21。
2.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361-381。
3.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11期，頁4-2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1993），頁59-60。
4.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8期，頁31-39。
5. 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遼金壁畫墓〉，《文物》，1990年10期，頁1-19。
6.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通縣金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11期，頁6、9-14。

表四 唐代龜形陶硯參考表

編號	發表時間	出土地／收藏者	時代	形制	隔欄	尺寸（公分）			備註
						長	寬	高	
1	1964/01			單龜，直頸，首上昂，帶龜背形蓋	無	22.4	16	9.1	原訂：漢；硯背刻銘：「寅」
2	1964/01			單龜曲頸，回首如飲水狀，帶龜背形蓋	弧形	24	20	10.3	原訂：漢
3	1964/01			雙龜，交頸交尾，帶龜背形蓋	無	17.3	13.9	7.8	原訂：漢
4	1964/02	河南上蔡縣賈莊	盛唐	單龜，直頸，首上昂，帶龜背形蓋	弧形	21.5			依據伴隨出土之陶俑與漆器花紋推斷
5	1965/12	上海市博物館		曲頸側視	彎弧形	22.2	17.7	5	背刻銘：「開方」；原訂：唐
6	1966	陝西西安郊區	盛唐	首殘	無	15.5	14.5	5	硯面殘留墨跡；依據墓葬狀況、遺物等分期
7	1984/08	河南洛陽（隋唐東都城遺址）	唐	殘存龜首與硯首局部	彎弧形	殘 14.5		殘 5	出於灰坑，依據伴隨出土瓷器推斷為唐代早期；硯池中有墨痕
8	1987/02(1985出土)	湖南郴州	唐（盛唐、中唐）	首殘，硯面凹弧，硯首列三小池，中為橢圓，兩側為圓形		11.6		3.6	出自水井，依據伴隨出土物推斷水井使用上限為隋末，下限晚至中唐
9	1990/01(1985出土)	陝西西安	唐	殘存龜首與一足					出自唐代長安西明寺遺址
10	1990/03(1989出土)	陝西咸陽市	唐	首、足皆殘，存左後足	無	15	10.5	6.5	唐周隆寺遺址出土；推斷為中唐
11	1992/08(1976出土)	山東濟南市歷城現郊而鄉		曲頸側視	彎弧形	20	13.4		原訂：唐

出處：

1. 〈硯史資料（一）〉，《文物》，1964年1期，圖版參。
2. 同前書，圖版肆。
3. 同前書，圖版伍。
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南上蔡縣賈莊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2期，頁63-65。
5. 吳樸，〈介紹上海市博物館所藏的幾方古硯〉，《文物》，1965年12期，頁55-58。
6. 中科院考古所編著，《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1966），頁62。
7.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隋唐東都城遺址出土一件龜形澄泥殘硯〉，《文物》，1984年8期，頁63。
8. 郴州地區文物工作隊，〈湖南郴州發現唐代水井〉，《考古》，1987年2期，頁114-118。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1期，頁45-55。
10. 咸陽市渭城區文館會（李朝陽），〈咸陽市渭城區出土唐代陶質龜硯〉，《考古與文物》，1992年3期，頁35。
11. 趙智強，〈介紹兩方陶硯〉，《文物》，1992年8期，頁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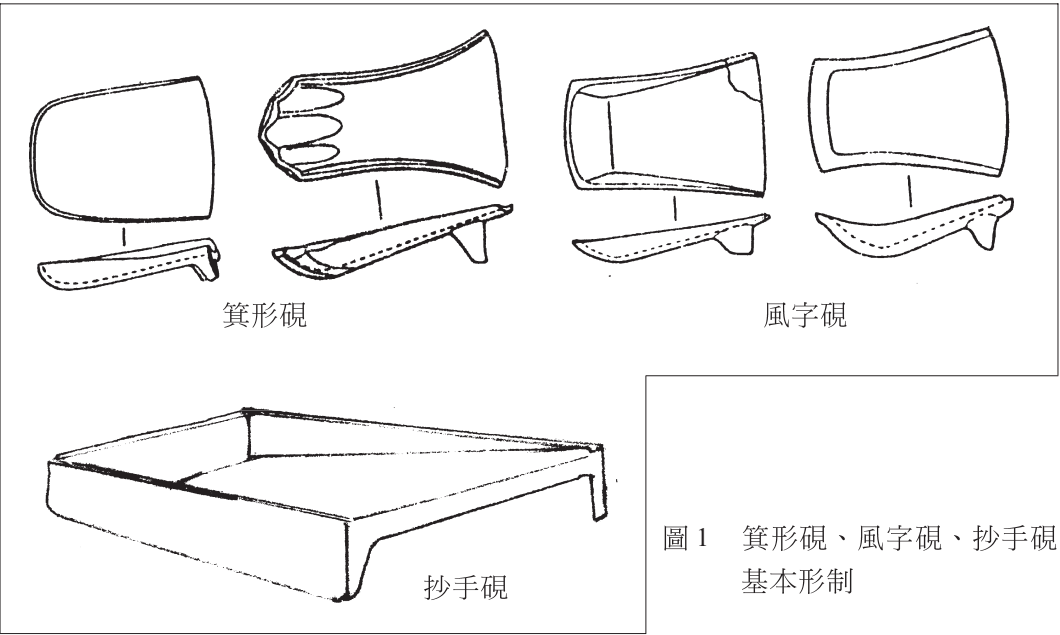


圖 1 箕形硯、風字硯、抄手硯基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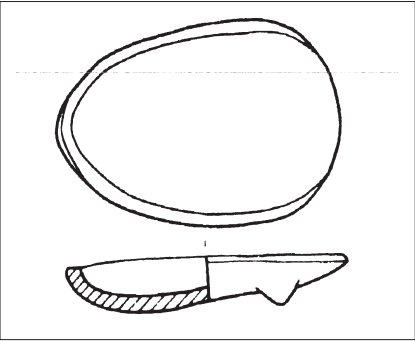


圖 2-1 盛唐 箕形陶硯 長 10.4 寬 7.8 高 2.2cm
寧夏固原梁元珍墓（699）出土
採自《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頁 122，圖八八：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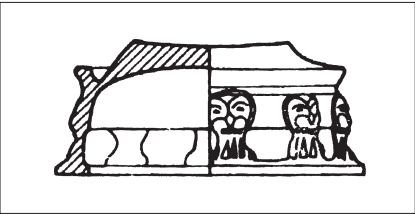


圖 2-2 盛唐 綠釉辟雍硯 高 2.6 徑 6cm
寧夏固原史索岩夫婦墓（658）出土
採自《固原南郊隋唐墓地》，頁 36，圖二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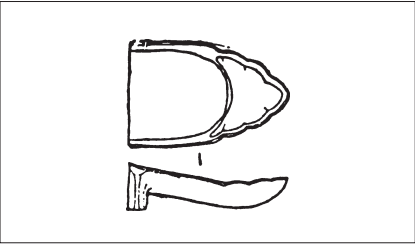


圖 2-3 盛唐 箕形陶硯 長 15 寬 10 高 4.2cm
河南偃師宋禎墓（706）出土
採自《考古》，1986：5，頁 432，圖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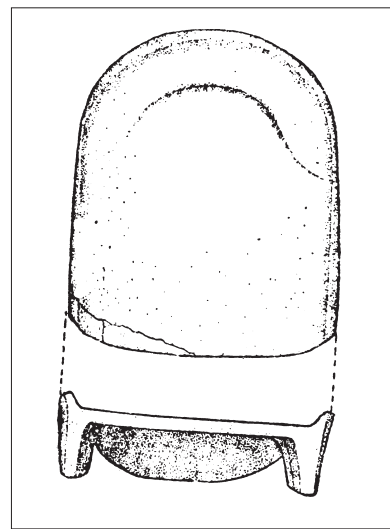


圖 2-4 盛唐 箕形陶硯 長 20.5 寬 18.3 高 5cm
廣東韶關張九齡墓（740 卒，數十年後遷葬）出土
採自《文物》，1961:6，頁 51，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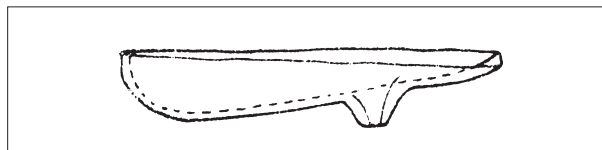


圖 2-5 盛唐 箕形陶硯 長 13 高 2.5cm
河南偃師鄭炅墓（721 卒，754 葬）出土
採自《華夏考古》，1995:1，頁 22，
圖一二：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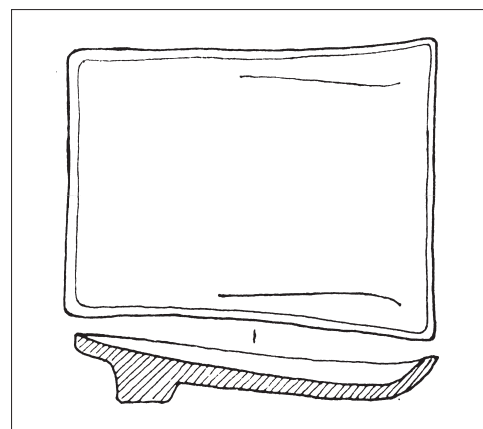


圖 3-1 中唐 風字陶硯
長 14.5 寬 10.8-13 高 1.5-3cm
湖南益陽七里橋鄧俊（？，763）墓出土
採自《考古》，1981:4，頁 316，
圖三：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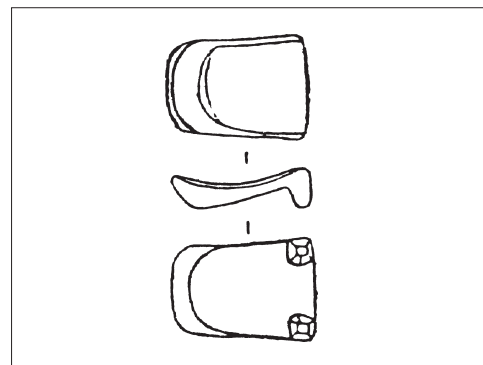


圖 3-2 中唐 箕形陶硯 長 8.6 寬 6.4cm
河南偃師杏園村鄭洵夫婦墓（778）出土
採自《考古》，1996:12，頁 8，
圖一七：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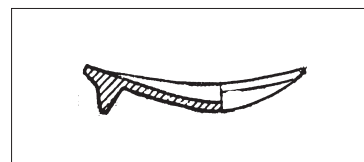


圖 3-3 中唐 箕形陶硯 長 8 寬 6.2 後高 1.8cm
南京錢家渡丁山唐墓（785 或 787）出土
採自《考古》，1966:4，頁 228，圖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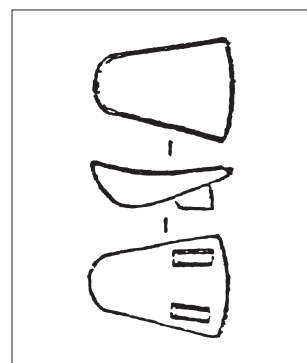


圖 4-1 晚唐 箕形石硯 長 16.6 寬 12.3 通高 5.3cm
河南偃師杏園村李郁墓（843）出土
採自《考古》，1996:12，頁 16，圖二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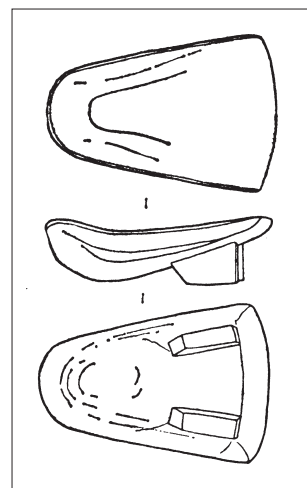


圖 4-2 晚唐 箕形紫石硯 長 15 寬 11cm
河南偃師杏園村李存墓（845）出土
採自《考古》，1984:10，頁 912，圖一〇：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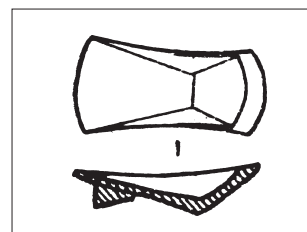


圖 4-3 晚唐 風字紫石硯 長 14.1cm
安徽巢湖市環城鄉伍鈞墓（842）出土
採自《考古》，1988:6，頁 524，圖三：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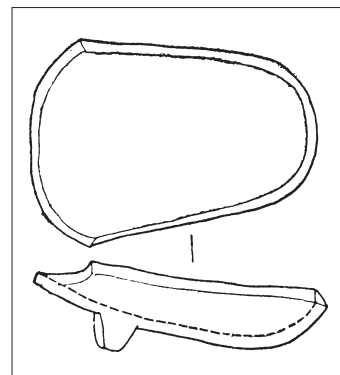


圖 4-4 晚唐 箕形陶硯 長 9.2cm
河南偃師杏園村李悅墓（869）出土
採自《考古》，1986:5，頁 452，圖三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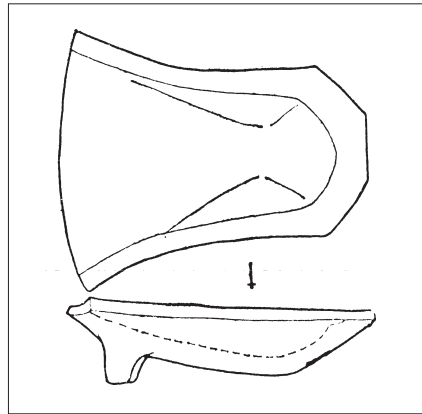


圖 4-5 晚唐 風字陶硯 長 9.8cm
河南偃師杏園村李悅墓（869）出土
採自《考古》，1986：5，頁 453，圖三八：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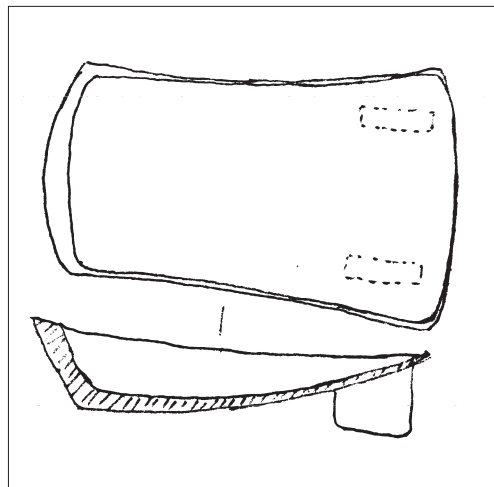


圖 4-6 晚唐 風字陶硯 長 14.6cm
湖北黃州市王家坊唐墓出土
採自《江漢考古》，1997:2，頁 17，
圖三：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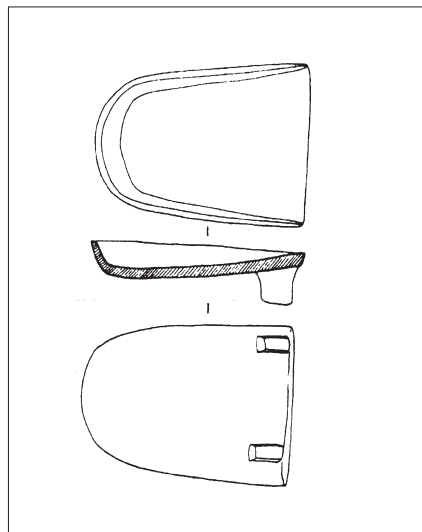


圖 4-7 晚唐至五代 箕形陶硯 長 8.2 尾寬 6.2cm
廣東和平縣彭寨墩頭村出土
採自《考古》，2000:6，頁 70，圖一二：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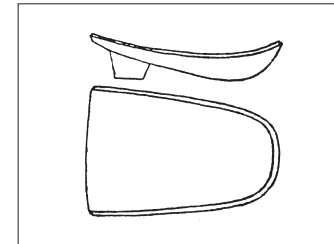


圖 5-1 五代 箕形陶硯 長 17.2 厚 0.5cm
江蘇揚州五台山五代墓出土
採自《考古》，1964:10，頁 535，圖六：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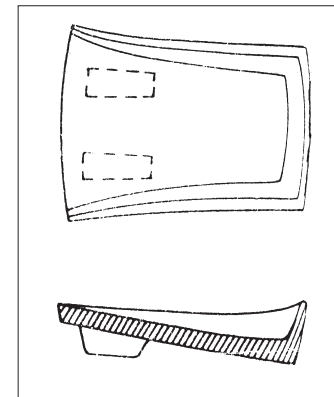


圖 5-2 五代後梁 風字陶硯 長 14 尾寬 10.1 高 2.7cm
河南洛陽高繼蟾墓（909）出土
採自《文物》，1995:8，頁 54，圖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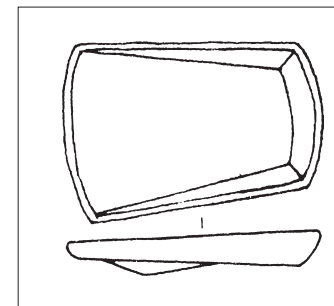


圖 5-3 五代南唐 風字陶硯 長 12 寬 8-10 高 2cm
安徽青陽縣南唐墓出土
採自《考古》，1999:6，頁 92，圖二：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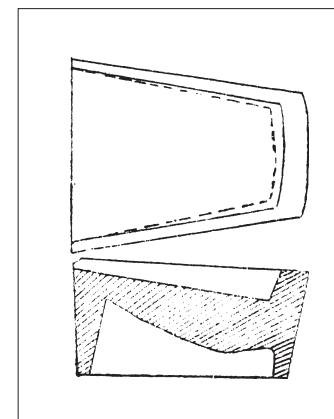


圖 5-4 五代 風字陶硯 長 12.8 寬 7.2-10.4 高 6.4cm
浙江樂清縣五代墓出土
採自《考古》，1992:8，頁 765，圖一：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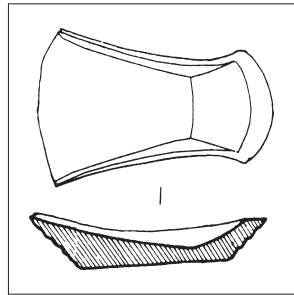


圖 5-5 五代 風字平底陶硯 長 18cm
廣東和平縣附城鎮五代墓出土
採自《考古》，2000:6，頁 70，圖一三：2

圖 5-6 五代吳國 端石抄手硯
長 12 寬 8 厚 1.6cm
江蘇邗江蔡莊五代墓出土
摹自《文物》，1980:8，
頁 45，圖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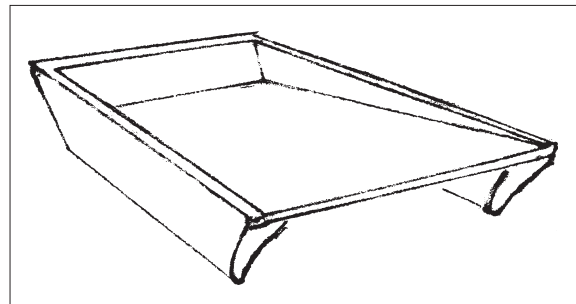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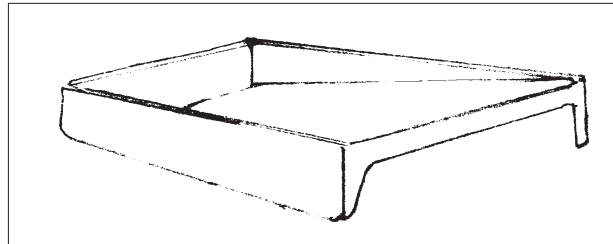


圖 5-7 五代吳越 抄手石硯
長 20.2 寬 12.7-14.7
高 3.7cm
江蘇蘇州七子山五代墓出土
摹自《文物》，1981:2，頁 44，
圖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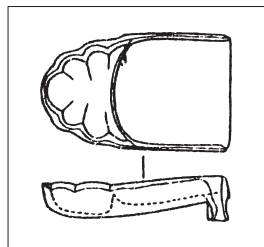


圖 5-8 盛唐 箕形陶硯
河南洛陽市出土
採自《文物》，1965:12，頁 50，圖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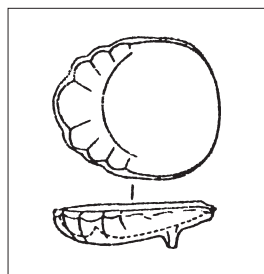


圖 5-9 盛唐 箕形陶硯
河南洛陽市出土
採自《文物》，1965:12，頁 50，圖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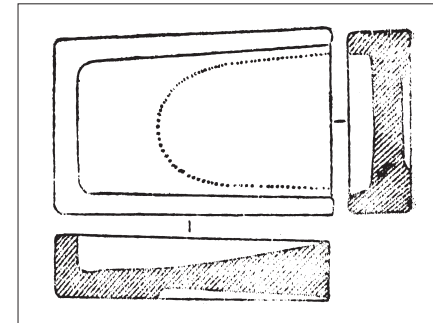


圖 6-1 北宋 風字陶硯
長 12 寬 7.3-8.1 厚 2.7cm
湖北英山縣大屋脊田三郎夫婦墓
(1077) 出土
採自《考古》，1993:1，頁 30，圖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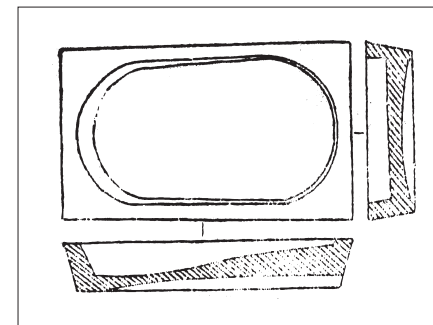


圖 6-2 北宋 風字陶硯
長 13.9 寬 8-8.4 厚 2.3cm
湖北英山縣郭家灣謝文詣墓 (1077) 出土
採自《考古》，1993:1，頁 35，圖九：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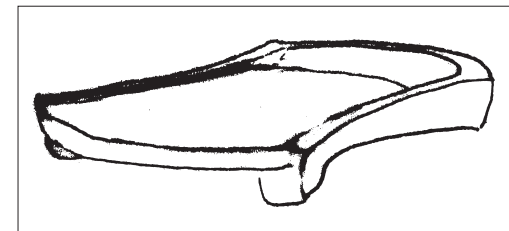


圖 6-3 南宋 端石風字硯 長 13.3
寬 8.8-10.7 首厚 1.8 尾厚 0.8cm
江蘇江浦黃悅嶺張同之夫婦墓 (1195)
出土
摹自《文物》，1973:4，頁 59，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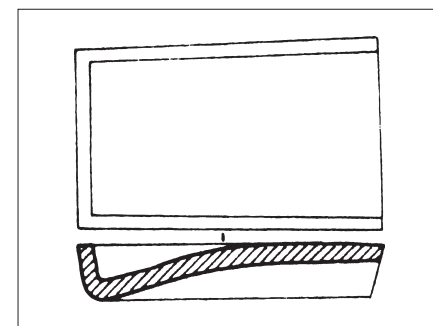


圖 6-4 北宋 抄手石硯
長 18-19.7 寬 12-12.7 厚 2.8-3.1cm
山東棲霞市慕家店慕伉墓 (1116) 出土
採自《考古》，1998:5，頁 49，圖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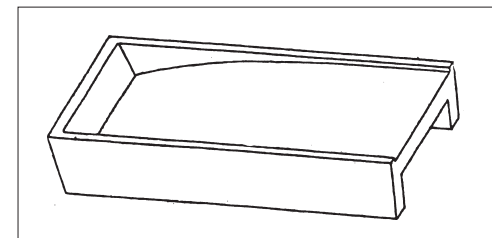


圖 6-5 北宋 澄泥抄手硯
長 14.9 寬 7.8 高 3.1cm
河北鉅鹿北宋城遺址出土
採自《鉅鹿宋器叢錄·第一編瓷器題
字》，頁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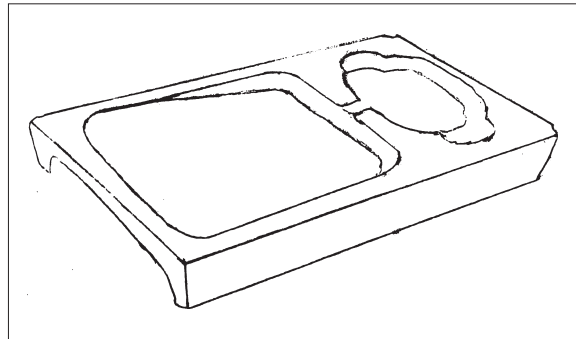


圖 6-6 北宋 包綬 抄手石硯
長 17 寬 10.8 高 2cm
安徽合肥大興集包綬墓（1105）
出土
摹自安徽省博物館主編《文房
珍品》，頁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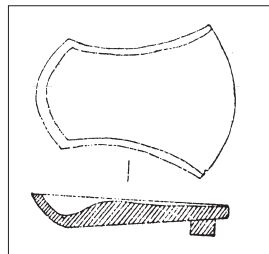


圖 6-7 宋 澄泥風字硯 長 16.3 最寬 12.4 高 2.5cm
安徽潛山彰法山宋墓出土
採自《考古》，1994:4，頁 382，圖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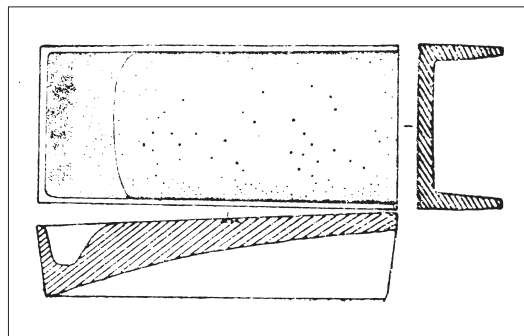


圖 6-8 南宋 抄手石硯
長 18.9 寬 8.3-8.6 高 3.7-4.5cm
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畫墓出土
採自《考古》，1995:10，頁 912，
圖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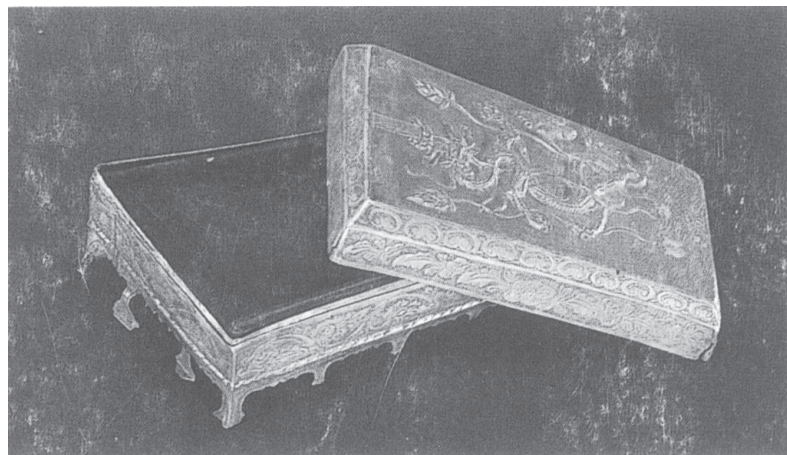


圖 7-1 遼代前期 銀鑲金「萬歲台」硯盒（內貯一遼硯） 盒長 18.4 寬 11-13.6 高 7.6cm
內蒙古赤峰市耶律羽之墓（942）出土 採自《文物》，1996:1，封底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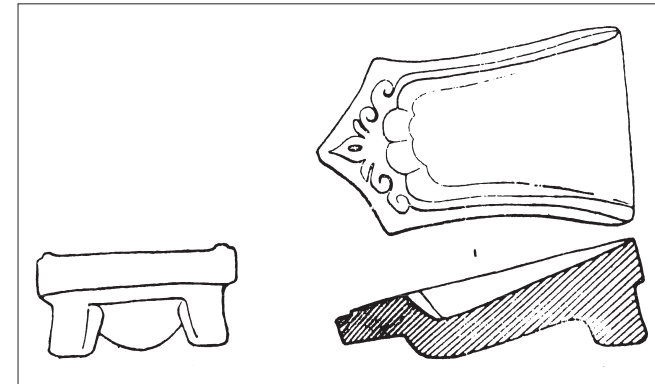


圖 7-2 遼代前期 灰陶箕形硯
長 10.3 寬 6.5 高 3.5cm
內蒙古敖漢旗沙子溝出土
採自《考古》1987：10，
頁 891，圖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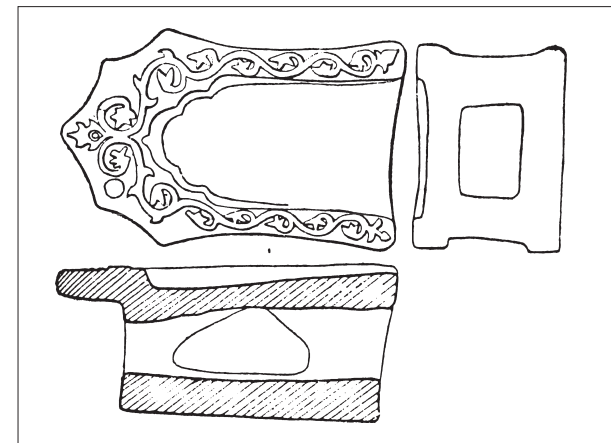


圖 7-3 遼代前期 灰陶箕形暖硯
長 22.8 寬 14 高 10.2cm
內蒙古敖漢旗沙子溝出土
採自《考古》，1987：10，
頁 891，圖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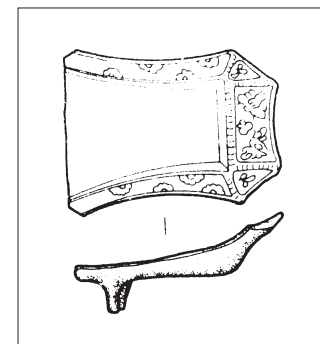


圖 7-4 遼代後期 陶箕形硯 長 15.3 高 6.9cm
河北宣化下八里張世本墓(1093 或 1144)出土
採自《文物》，1990：10，頁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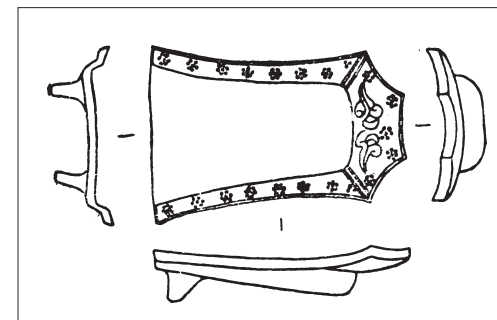


圖 7-5 金 箕形陶硯 長 20 寬 14 厚 0.8
底長 16.5 底寬 12cm
北京市通縣金墓出土
採自《文物》，1977：11，頁 15，
圖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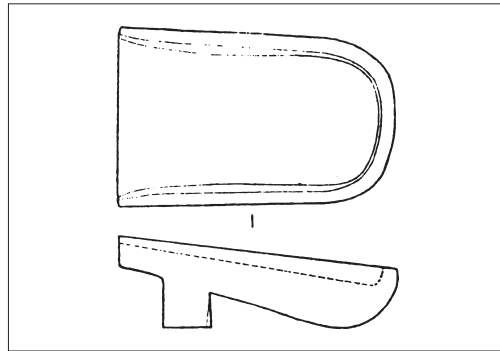


圖 7-6 遼代前期 玉箕形硯
長 12 寬 7.2 高 2.6-4.1cm
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
(1018)出土
採自《遼陳國公主墓》，頁 60，
圖三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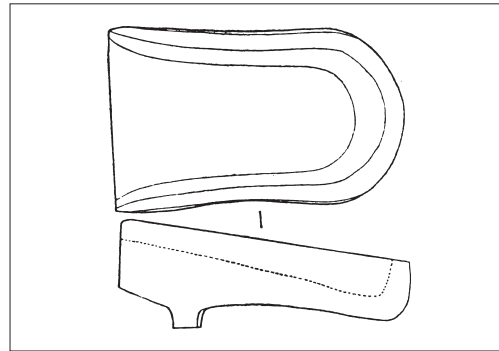


圖 7-7 遼代前期 玉箕形硯
長 8.5 寬 5.2 高 2.1-2.8cm
內蒙古哲里木盟遼陳國公主墓
(1018)出土
採自《遼陳國公主墓》，頁 60，
圖三六：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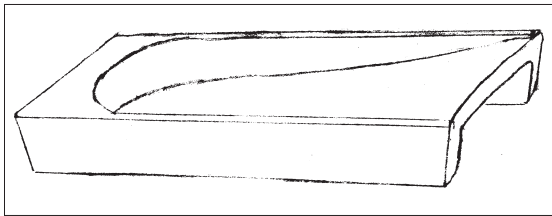


圖 7-8 遼代後期 澄泥（？）抄手硯
河北宣化張世卿墓(1116)出土
摹自《文物》，1975：8，圖版
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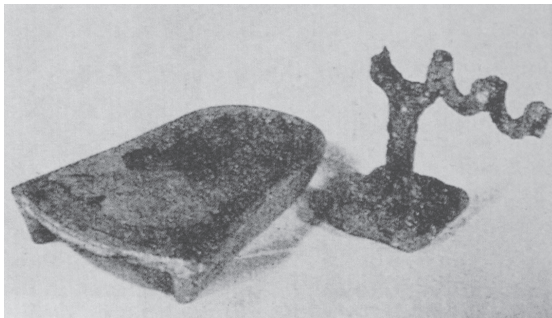


圖 7-9 遼代前期 灰陶抄手硯
高 3cm、長 15.5cm
北京韓佚墓(997)出土
採自《考古學報》1984:3，圖版
二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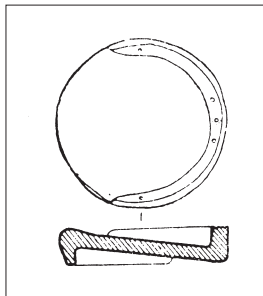


圖 7-10 遼 陶圓硯
內蒙古敖漢旗白塔子出土
採自《考古》，1978:2，頁 121，圖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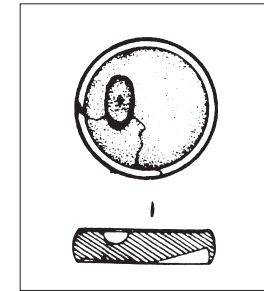


圖 8-1 唐 陶圓硯
陝西臨潼縣唐華清宮梨園遺址出土
採自《文物》，1999:3，頁 39，
圖三〇：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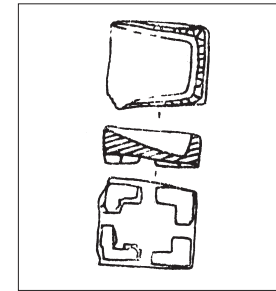


圖 8-2 宋 風字石硯 長 6.4cm
山東牟平縣出土
採自《考古》，1997:3，頁 51，
圖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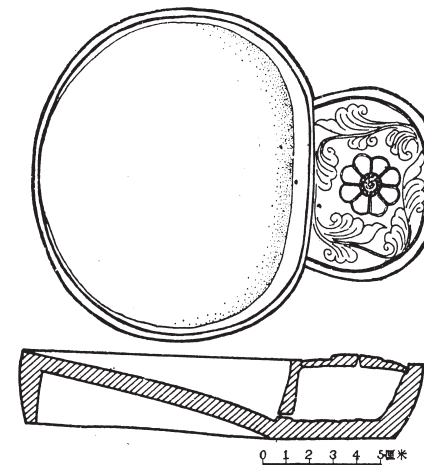


圖 8-3 南宋 葫蘆形端硯 長 17.2 寬 8.2-13.9
高 3.3cm 江蘇鎮江市出土
採自《文物資料叢刊》，10 輯，1987 年
3 月，頁 163，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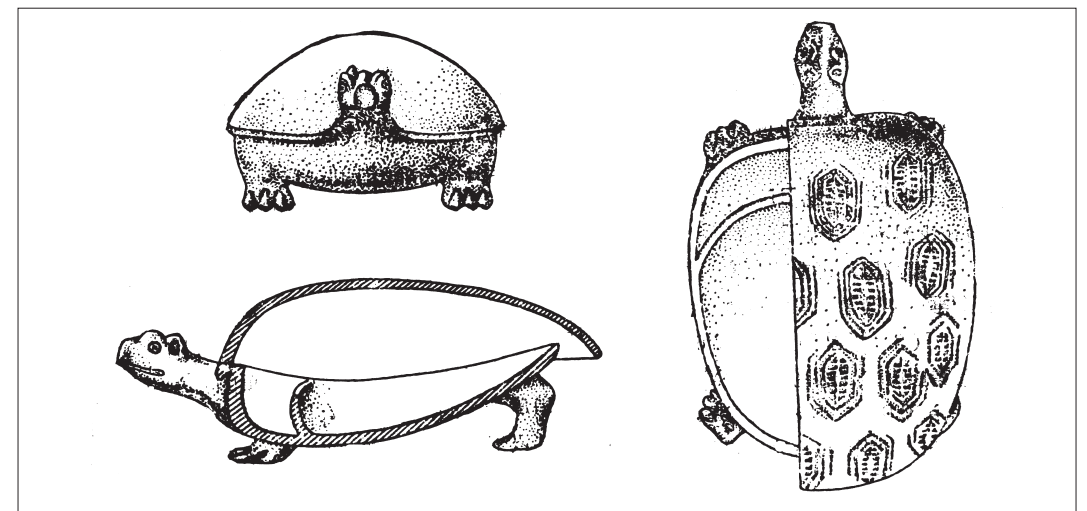


圖 9-1 盛唐 龜形陶硯 同長 21.5cm 河南上蔡縣賈莊唐墓出土
採自《文物》，1964:2，頁 64，圖一：1-3